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2017 · 08, 4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广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朱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李 蓉 04

【峥嵘岁月】

半个世纪的不了情 房兴华 王敬涛 10

伏击歼灭临郯苍汉奸宪兵队
孙怡录 黄秀成 陈玉波 17

铁军大帐追歌行（八）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9

【名人素描】

周纯全：阴影伴随一生 靖一民 28

萧衍：爱做和尚的皇帝（下） 我爱看历史 34

【文化掇英】

抗战词曲家沈肇华在鲁南 王晓华 39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八）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43

【史海撷萃】

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死亡之谜
大国雄兵 46

【文史论坛】

季氏与费县（上） 丁兆铭 49

【探索发现】

鲁南铁道大队英雄徐广田 高 雷 55

【古城旧事】

记忆中的老建筑——五贤祠碑亭 本 编 62

【诗画欣赏】

沂蒙抗战版画群体（下） 大荒堂主 63

【影像沂蒙】

世界第一橡胶坝建设记 本 编 65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六） 赵丹峰 68

【文明之星】

三代红嫂的爱党拥军情 李依璐 蔡文玉 72

【沂蒙名医】

一卉能熏一室香
——李莉印象记 胡爱军 75

【史志动态】

80

封面：五贤祠碑亭

（详见本期《五贤祠碑亭》）

封底：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虚实》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朱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李 蓉



朱德与毛泽东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抗日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结果。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倾注了许多心血，从中可以看到朱德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

一、提出一系列指导抗日根据地创立的重要指导思想

全国抗战开始后，朱德根据党的部署，主要注意力是在华北的山西、河北。随着战争的进行，特别是忻口会战、徐州会战以后，战争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和突出，开始形成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的敌后战场，并逐步地从山地发展到平原；在平原发展遭到阻碍时又更加重视山地游击战。朱德在对抗日根据地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朱德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是明确提出了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原则。敌后根

据地的创建和建设，都和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联系在一起。1938年1月，抗敌救亡出版社出版了署名朱德、彭德怀合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全书分为六编，前五编分别阐述了游击战术基本原则、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战争动员问题、民族战争的战略和怎样发动游击战，第六编附录《游击战术之光荣史略》和《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两篇文章。《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从“持久抗战的胜利”“战略与战术”“游击战争”“民众的动员与全民抗战”等六个部分，总结了抗战三个月来的经验教训，阐明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伟大的事业”“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规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在持久作战过程中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而“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的，“只有坚持持久的抗战，才能最终地战胜敌人”。这部著作的部分内容以《论抗日游击战争》为题编入《朱德选集》。

朱德提出要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目标。1938年2月3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聂荣臻，指出：“应有最大决心与敌在山地坚持，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敌人与在有利条件下部分地消灭敌人。吸引敌人在山区长期周旋，于我军有利。”2月12日，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召开的平汉线胜利祝捷大会上，朱德发表《平汉线胜利的意义》演讲时说：本月9日晚，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之一部及当地新近成立之民众武装部队，在同一时间内，统一指挥下，由保定至正定间铁道线分途进攻，占领了定州、望都、新乐、浑源等重要城镇及三百余里的铁道线，敌人被击毙八百余人、被俘四十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二十余挺及手榴弹、子弹和其他军用品等，铁道线与电线也全被破坏。朱德指出：这个胜利虽不算大，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它具有配合津浦线主力作战阻止敌人南进、打破敌人武力吞并全中国的迷梦和发扬了民众抗敌的力量、揭穿了汉奸的阴谋等重大意义。并强调指出：“敌人占领这些地方已经好几个月，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料还有强大的部队留在他们的后方，开展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要对他们作生与死的抵抗。敌人满以为把华北吞下了肚子里去了，岂知我们在他的肚子里发展起游击战争来，不但要把敌人胀死，还要把他的肚子戳破，还要把他的心脏挖出来。这一次的战斗，向日本强盗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不能征服的，在他们占领的地区里，有着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终有一天会团结起来，以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将他们这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强盗消灭干净。”

朱德深刻论述和研究了抗日游击战与抗日根据地的关系。朱德在所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发表于《前线》杂志第五期；1938年3月25日，第六期连载；5月7日、14日，《群众》杂志第一卷第二十期、二十二期又刊载。1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论抗日游击战争》，全书分为三章十七节，已陆续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为该书的第一章“总论”）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就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其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强调：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就“在于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该书第三章“抗日游击队的战术”，分别就“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方针”“进攻战术”“防御战术”“追击战术”“破坏战术”“侦察”“通信联络”“行军”“宿



营”“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加以阐述。

1938年3月4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各师指挥员，分析战争发展态势，并指出关于游击战术的原则：“正当华北敌人配合东线战场以争夺徐州，主力已南犯，先头（部队）已抵黄河北岸与东岸作战”，“整个华北战局已转入大规模的游击战与运动战之新阶段”，“敌人仍只占领点和线，民众仍与敌对立，而且（日）益严重”；“民众抗日运动与游击战已有相当的发展，这是给我军在华北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与运动战中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允许大踏步地进退，在广大地区内以灵活机动去求得胜利”。

二、关注和指导鲁南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朱德也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落实。193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兵力部署上要以鲁南山地为根据地，抵抗日军的侵略。这是建立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部署。1938年2月15日，朱德收到毛泽东、滕代远致朱德、彭德怀、林彪、左权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估计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拟用第一一五师至少分三步骤全部向东出动。第一步转入河北、北平、天津；第二步分数路突然渡黄河，转入山东，以鲁南山地为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第三步转入安徽，以豫鄂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如经你们考虑，认为可行时，则请周、叶向国民党接洽出河北的各种必须事件”。

在朱德和彭德怀的考虑中，开始对鲁南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还有一些不完全一致的意见，所以开始时先同意进行短时期活动。1938年2月17日，朱德和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滕代远、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及林彪等：津浦、平汉两路间已有吕正操部3000余人，陈再道部两个营，各附骑兵一部，且有地方党及自发群众武装等共约万人。乘敌空虚，可以徐旅一部或主力东出，活动一段时期是可以的。但要估计到两道间汽车路网之完成，地形平坦而开阔，大兵团深入运动，在技术发达条件下，是带着某些冒险性的。至于东渡运河、黄河转入鲁南的条件，我们认为可能极少。至于陈光旅似不宜再向东出。2月18日，毛泽东复电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叶剑英并林彪：即照朱、彭意见准备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出安徽，请周、叶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介石提议，但此时机未到则不要提。同意彭去晋东指挥，朱在后方较妥。

随着战事的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1938年3月7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建议：情况变化，政治局以前关于战略决定应有所改变。在友军不过河以前，我们应坚决而积极地在华北坚持配合友军作战，争取连续的胜利，以达到有力地保卫武汉、保卫西北和巩固统一战线。如我们现时过河，万分不利于统一战线。3月9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长子县上寨村的当日，收到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并各师首长电，说明：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在目前阶段，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的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河来。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



彭德怀、朱德、彭雪枫、
肖克、邓小平（从左至
右）在太行山

3月9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长子县上寨村后，即与彭德怀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毛泽东：为积极发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及扩大游击区，着第三四三旅副旅长李天佑、政委萧华率旅部及第六八六团全部，并附一个团的团、营、连预备干部，准备出直鲁豫边区。陈光、罗荣桓率师直及第六八五团、补充团暂在吕梁山工作，准备8月中新的行动。后来，萧华奉命率部东进，准备到敌后津浦线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路过晋南太行山时，特地来到朱德驻地听取指示。朱德与彭德怀指示他们：要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派你们到敌后去，你们是火种，目的是要在广大的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点燃抗日的熊熊烈火。你们远离总部，是敌后的敌后。为了创建根据地，你们的一切供应都要依靠人民支援，都要依靠你们自己解决，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平原游击战争是一个新的问题，要很好地组织游击队和自卫队，创造作战的经验。准备长期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调兵遣将，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1938年3月13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叶剑英转蒋介石：已遵令派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东进迫近津浦线行动。3月24日至28日，朱德在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主任兼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政委薄一波外，国民党军队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及其他副师长、旅长等共30余人。朱德在会上讲话，分析敌我形势，介绍八路军粉碎日军进攻和坚持敌后战争的战略战术，鼓励国民党军队将领为抗日做出贡献。还与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将领个别谈话，向他们指出：抗战初期战事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抗日民主，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搞好军民关系。单纯军队抵抗是打不好的。要他们开展抗日民主，搞好群众关系，把旧军队改造成新型的军队，废除旧军官对士兵的统治，改善官兵关系，

训练政工人员，建立政治工作。

1938年3月29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第一二〇师无变动，陈光旅在蒲县、隰县间，刘师主力移涉县、武安，徐海东旅在武乡附近。因吕梁山地区窄小，友军过多，徐旅暂不西移。朱、彭目前不能分开。4月1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转时任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宋任穷：停留在河北南宫附近的津支队，我们意从山东临清县及武城县之线渡运河，似较安全。渡河后即以高唐县、恩县（旧县名。在山东省西北部。1956年撤销，划归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夏津线为依据地，向德州、济南之线发展，破坏该段交通，暂不过津浦路以东。范筑先在聊城附近，须与之取联络。5月9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刘伯承等：敌夺取徐州后，华北形势将更加困难。以前派出之东进部队应向沧州、德州一线积极动作，以配合津浦北段作战。5月12日，朱德与彭德怀复周恩来10日询问可否由徐向前率部东出津浦，加强陈再道支队电，告以：徐向前率三个团已过路东与陈再道、宋任穷纵队会合，准备继续向南活动。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徐州会战基本结束。5月20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并告王明、周恩来、叶剑英电，指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后活动，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等提出，只是自己预作准备。并告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张经武，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后到山东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郭洪涛，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兼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后到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率党政军干部五六十人及两个电台去。5月26日，收到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傅钟并各师首长电：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华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加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猛烈地发展革命力量。1938年5月30日，朱德与彭德怀发出关于开展平汉路以东工作指示，认为依目前形势，在直、鲁展开工作，猛烈发展我们的力量，已成为路东党和军队的重大任务。路东部队应配合地方党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尽量组织广大民众提高情绪，参加武装抗日斗争。强调在敌后恢复政权，一般仍用旧形式，但为加强并增高行政效率，适合抗战需要，应在县、区、村设立行政会议，由各民众团体选代表参加，在民主集中原则下讨论和决定工作。县长应由民选当地抗日积极分子担任，但仍加委。经过我们工作活动，把地方进步分子尽量吸收到政权中工作。在政权恢复区域，刷新教育，恢复学校。还强调应选择当地进步分子培养成为民众团体和政权机关工作的工作人才；注意发展地方党，建立党各级组织，特别是新成立抗日武装要建立党的组织；要确实依照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德怀同志关于该决议的报告和结论，按具体情况运用执行。

三、朱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朱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指导部队完成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务。

作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坚决执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后，朱德从实际出发加以落实，特别是提出具



体措施，保证中央决定的落实；直接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在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2. 为八路军在山东的作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性原则。

朱德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八路军一系列正确的作战原则，如持久战、人民战争、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对于八路军在山东的展开，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高度评价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0年2月，朱德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中共山东分局，指出：山东是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基地之一，是发展华中与新四军一片的枢纽，是八路军兵力、枪支、经济补充的重要地区。朱德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加以明确的战略定位，从抗战大局出发，明确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对指导全国抗战的进行，发挥山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是十分必要，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事实证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真正发挥了作为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基地之一，发展华中与新四军一片的枢纽，八路军兵力、枪支、经济补充的重要地区的重要作用。

4. 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根据地建设包括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为根据地建设指明方向。

朱德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建设过程中，不仅考虑军事问题，也考虑财政经济问题等，这对根据地的建设十分重要。有了经济这个基础，才可能说得上为八路军提供经济上的补充。他在电报中还指出：为巩固各抗日根据地，还要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要抓紧几方面的工作：如分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党政军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办法；北海银行应在胶东清河发行纸币，鲁南、鲁西应统一发行纸币，纠正不统一的各自为政的办法；公布其政权的财政工作，实行累进的财政，建立对外贸易，拨粮收税、屯积公粮，求得解决财政的长远计划；实行节省运动，按照预算开支，惩办贪污浪费分子。这些指示为山东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

朱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关系，仅仅是朱德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大量工作的一个方面。仅从上述的资料就可看出朱德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密切关系，而从其中更可以看出朱德对建立根据地的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重视，对财政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对于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半个世纪的不了情

房兴华 王敬涛

一、战友嘱托

1948年，临沭县石门镇徐庄村16岁的热血青年薛义昌，报名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的一员，他参加了抗美援朝，于1950年10月开赴朝鲜与美军作战。在1951年的一次战斗中，薛义昌不幸负伤，被转到辽宁兴城陆军十三医院。住在5队30病室接受治疗。在医院里，薛义昌结识了同住一个病房、床位相邻、同样在朝鲜战场负伤回国接受治疗的华北军区六十六军山西吕梁山区的隰县籍战士郝英祥。一段革命情谊从此诞生、延伸。

那年，他俩都是18岁，都是团部通讯员。郝英祥左臂被飞机的机枪子弹贯通，造成粉碎性骨折，为二等伤残。薛义昌右臂被炮弹片炸伤，为三等伤残。薛的伤势相对较轻，便主动担当起郝的义务护理员，系鞋带、穿衣服、扣扣子、端饭、打水，连上厕所都是薛帮忙。当时，郝因伤势重非常悲观，薛就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使他重新树立起生活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交往中，郝英祥了解到，薛义昌先后参加过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作战勇猛，曾负过一次重伤，1950年入了党，在解放上海时还荣立一等战功。因此，郝对薛的钦佩、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郝英祥也常常帮助薛义昌。薛不识字，郝便成了薛的文化辅导员，教他认字、写字，为他念家信、写家书，因此也了解到薛的家乡及家庭情况。郝为薛代笔的第一封家书，一直保存在薛的老母亲手中。相同的年龄、一样的战



斗经历、共同的革命志向与追求，使他们在朝夕相处的3个多月内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情同手足的兄弟。

性格内向、老成持重的薛义昌像兄长般的关心稚气未脱、活泼可爱的郝英祥。仅仅几天，他们就渐渐地崇拜起对方来，薛义昌不仅早郝英祥一年从军，还是党员，曾在淮海大战搏杀、横渡长江竞舟、解放上海冲锋，是个驰骋疆场立过战功的“老同志”，这令渴望早日当上英雄的郝英祥仰慕不已。虽然郝英祥初中还未毕业，但在全院伤员中却是学历最高的，连医院政委也不时找他写家书，从没进过学堂的薛义昌觉得郝英祥很了不起。于是，郝英祥从薛义昌那里学习了不少战斗和生活的经验，同样，受郝英祥的影响，薛义昌学文化的兴趣也一天天大了起来。

薛义昌、郝英祥两人无话不说，但谈论最多的还是母亲。薛义昌的母亲33岁即守寡，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1948年母亲亲自送他参军，淮海战役前夕，又背着煎饼，踮着一双小脚，步行100余里到部队看他……说到动情处，薛义昌眼里挂着晶莹的泪珠，也就从此开始，郝英祥心目中刻上了薛母深深的印迹。

薛义昌伤愈后，到健康队疗养，郝英祥架着伤臂三天两头去看薛义昌。看到健康队痊愈的伤员纷纷写申请要求重返前线，薛义昌也让郝英祥代笔替他写申请。重返前线是无尚光荣的，令郝英祥羡慕不已，同时又为薛义昌赴朝后可能和自己失去联系而担忧。他俩商量了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郝英祥代笔给薛义昌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嘱托哥哥将自己的通讯地址转告郝英祥。

薛义昌的申请报告很快得到批准。1951年4月21日，兴城党政军在火车站举行隆重仪式，欢送志愿军伤员重返前线。临上车前，薛义昌对郝英祥说：“我到朝鲜以后就不可能通信了，你在这里隔一段时间给我家里写封信，问问家里的情况，安慰安慰我母亲。”郝英祥紧握着战友的手，用力摇了摇：“上了前线要多消灭几个敌人，你放心，你让我办的事保证做到。”

二、书信认母

薛义昌走了，也带走了郝英祥的心，他日夜思念前线的战友。他开始给薛家写信，问家中安好，问薛义昌的近况，但得到的却是失望的回答，因为薛家也正为没有义昌的消息而焦急。时隔半年，郝因残转业到老家山西隰县工作后，为了问候薛的家人，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薛的近况，又给薛的家人去了第二封信。收到的回信中，薛的家人也问薛的下落和情况。郝当即向部队、志愿军司令部多方写信询问，郝英祥是经过枪林弹雨的人，知道战争的残酷，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结果很快得到证实，战友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英祥同志：部队上给咱家来了信，说义昌……县政府把烈士证送到咱家，全家都悲痛万分，尤其是母亲每日啼哭不已，以泪洗面……”这是大哥薛其昌给郝英祥回信的内容。他没有想到战友临别时质朴的嘱托竟然成了谶语，他痛惜朝夕相处的战友捐躯异国；他更忧伤，为丧夫失子饱受创伤的薛义昌的母亲，郝英祥决心践行他和战友的生死承诺。

“我们不应该流泪，因为义昌是不喜欢我们流泪的，我们要为义昌感到光荣。”在信中郝英祥还向薛家倾吐了一个愿望：“我虽然没有见过老母亲、哥哥、弟弟、妹妹，但是我心里时刻想着你们，我和义昌是战友，可我觉得更像亲兄弟……请你们全家人都把我当成你们家的一分子吧，我是愿意和你们建立亲如一家人的关系的！”郝英祥悲痛万分，彻夜难眠，眼含热泪给薛的母亲又写了一封信。

革命的妈妈：

您好！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战争是无情的，义昌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请您不要难过，从现在起，我就是您的儿子。战士的职责就是战斗，战斗就会流血，就会有牺牲。援助邻邦，保卫世界和平，这是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朝鲜战争的胜利，正是用我们千万人的鲜血换来的。像义昌这样的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是不愿我们为他难过的。只要我们振作起来，为我们国家的富强而奋斗，也就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

妈妈，坚强起来，不要流泪，您要为有义昌这样的好儿子感到光荣。妈妈，我虽没见过您，但我想象得出，你一定是位很慈祥、很善良的好母亲。您不要认为我远离您千里，不在您身边，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就是您的亲儿子。妈妈，认下我这个儿子吧。您看见了吗？儿子在这里给您叩头了。

儿：英祥

1952年4月14日于山西隰县

薛其昌即刻回信，“英祥弟见字如面，接弟信后，母亲很高兴，她说收下你这个儿子了。我希望弟见信后，以后要多通信，才能免得咱母亲的挂念。母亲说，十天半月你来封信，就好像是义昌的信，她拿你也就当‘义昌弟’了。”信中“母亲”令郝英祥感到无比幸福，即日他兴奋地复信，“从此我有了两个家，有了两个妈妈，有了哥哥、弟弟、嫂嫂、妹妹，这使我很高兴，使我感到再不是孤单的独生子，是不是这样呢？尊敬的妈妈，我这么说您一定高兴吧！山东的家和山西的家相距千万里，但都同样牵挂在我心上，都是我日思夜想的家乡。”

家书抵万金，家书寄深情，这一写就是48年。在这漫长岁月里，书信将郝英祥与薛义昌的母亲、家人紧紧连在了一起。郝把薛的家真正当成自己的老家，在薛的母亲眼里，郝已成了亲生儿子的化身。郝与爱人闹别扭，他要通信向山东妈妈说说。老人家的生活情况，她也愿找人写信向山西的儿子唠唠。他们对各自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即便是在“文革”中，郝被关进“牛棚”，也没忘记山东妈妈，依然书信不断，问候声声。中秋佳节，他捎去一片深情；每逢新春，他又带去诚挚问候。48年，鸿飞雁往，谁能数得清郝英祥寄出了多少封信？寄出了多少无价的情意？这些信只不过是邮海一粟，可是它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在这半个世纪中，老人家一封不少，一页不缺珍藏着儿子的来信，这些发黄甚至发黑的信，象儿子厚实温馨的手抚慰着母亲伤痕累累的心扉，伴随她在漫漫人生旅途中跋涉，搀扶着她迈进90高龄的年轮。时至2000年，已92岁高龄的老妈妈和郝英祥仍一封不少地保存着每一封信。想儿的时候，老妈妈就翻翻这些信，让人念上几封。透过其中一封信，足可以看见他们之间的浓浓亲情。

尊敬的妈妈：

您好！大约是8月上旬写了封信，至今已有3个多月了，不见您老人家的来信，心中甚是惦记。今午，忽接来信，儿喜出望外，知道您老人家又在想儿子了。

妈妈，不瞒您，最近几个月来，我和爱人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当然，我们不像一般没有文化的人那样吵嘴打架，主要是我们思想之间的隔阂。详细情况现在我不打算告诉妈妈，因为您有许多事就够烦心的了，怎么能叫您再为我操心呢！

来信得知，咱家分开吃饭，各过各的了。这也有一定的好处。俗话说，树大了分枝，孩子大了分家，人在一起多了，总免不了会勺子碰锅沿。他们都已大了，让他们各自成家立业好了。但是分开家，并不等于谁也不管谁，有了事还要相互帮忙，特别是其昌哥（薛义昌的大哥），年龄稍长，在各方面可以多照顾小弟。我在部队的时候，年纪小，同志们都爱护我、照顾我，我负了伤走不动，一个同志背上我从火线上下来，翻了好几座山，这是多么崇高的友爱！何况我们同胞兄弟，更应该时常关心，互相照顾。这是我对咱们家的期望。

听说妹妹要出嫁，这是件喜事，我向她祝福。不过婚姻大事，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幸福和痛苦的，所以一定要妹妹自己作主，别人不要干涉，更不能包办。我离得太远，不可能了解男方的家庭情况和人品，所以也不可能参与具体意见，但一定应该叫妹妹对男方有个彻底的了解，并且最好叫他们在未婚以前就建立互敬互爱、互相帮助的爱情，这样，将来他们才会幸福。让我在遥远的山西祝妹妹婚姻如意幸福。

这是我买的6双袜子和两块香皂，东西不多，也不珍贵，表明我微不足道的心意罢了。

祝母亲新年愉快！

远离您膝下的儿子：英祥

阴历十一月初六

三、千里探家

郝英祥魂牵梦挂着一个心愿，就是到山东那孕育了烈士的村庄探望亲爱的妈妈，在母亲的膝下献上游子的一片赤诚。但是繁忙的公务，动荡的年代，家境的窘迫使他几欲起程而未能成行。他只能在地图上找到家乡，在梦中见到可敬的母亲。然而，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和妈妈相聚。他在信中写到，“我去山东的愿望是强烈的，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哪怕是一次，也算了了我这辈子的心事，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妈妈把身体保养好，我们一定能见上面。”鸿雁传书，使郝英祥对山东妈妈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深，看望妈妈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77年，郝英祥终于圆了探望母亲的梦。在前一年他调到县石油公司，便萌发了山东之行的念头，于是他向公司领导请假。公司经理没想到，工作一贯勤恳的郝英祥怎么刚一报到就要请假，郝英祥无奈向他吐露了心事。经理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先不要走，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去。”经理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1977年10月华北地区石油工作会议在河北沧州召开，经理把出差的机会让给了他，并嘱咐他绕道山东看望母亲。临行时他握着郝英祥的手，“替我向老人家问好。”郝英祥踏上了探望山东妈妈的旅程。他几经转车，一路打听，历经三天半时间，终于摸到了地处鲁苏交界处的“老家”——徐庄。

郝英祥到薛家的那一天，母亲正巧坐独轮车去了五里外的闺女家。当独轮车吱吱扭扭回来停在院中，郝英祥看见了26年朝思暮想的母亲。“英祥儿啊！我可是把你盼来了！”母亲恸哭声在院中回荡，这是辛酸的泪水，老人家想起了26年前壮烈牺牲的义昌；这又是喜悦的泪水，老妈妈终于看到了久别26年的活生生的“义昌”，郝英祥望着满面风霜、两鬓斑白的老妈妈，老妈妈端详着魂牵梦绕的儿子，他们不由自主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泣不成声。老妈妈分明看到远征的二儿子义昌突然回到了自己身边。良久，母亲为郝擦去泪水：“儿啊，你可回来了！”

当时，薛家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家人靠吃薯干煎饼度日。而老妈妈却特意做了白面馍馍给郝英祥吃，每顿还要炒几个菜。郝眼含热泪咽不下去，让大家一起吃，老妈妈却安慰他说：“儿啊，吃吧，俺们乡下人苦惯了，吃什么都行。你这么远来看我，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由于山西工作离不开，也为了不增加老人家负担，这次郝英祥只在老人身边住了半个月就赶了回去。15天里，母亲颠着小脚寸步不离英祥，儿子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好像英祥是个小孩子，怕摔着、怕丢了、怕受人欺负。她抚摸着英祥左臂的伤口，问他的母亲、问他的媳妇、问他的孩子、问他生活的点滴，唯独不提自己26年的心酸和艰辛。

离开山东时，母亲为他打点着行装，花生米、花生饼、花生油塞了满满一提包，知心话也装了满满一提包。临行时，母亲让人搀扶着，走到五里外的汽车站，送别郝

英祥。

回到家，郝英祥顾不上旅途劳顿，当即给老妈妈写了信：

亲爱的妈妈：您好！

我已在29日中午赶回了家。我虽距您遥远，但感觉近在咫尺。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眼前浮现：您正在忙着为您远道而来的儿子炒菜做饭，我们坐在小凳上，拉家常、吃饭……我不禁鼻子发酸，眼睛湿润了。忘不了，您这山东勤劳朴实的妈妈，还有沙土地、茅草屋和黑乎乎的薯干煎饼，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出外20天，工作落下不少，回来一定很忙。我怕妈妈和家人挂念，所以一回来就赶快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妈妈，我见到您很高兴，我会常想起您的，我会常看望您的。

祝您长寿！

儿：英祥

1977年11月29日

从此以后，郝英祥的心里老是惦念着茅草屋内吃着黑乎乎薯干煎饼的山东妈妈。

1987年郝英祥再次踏在了沂蒙土地上。时值盛夏七月，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村庄里一排排红砖青瓦房拔地而起，旧貌换新颜，变了，一切都变了。郝英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自己的家，妈妈已是81高寿，但仍精神矍铄，口里直唠叨：“上回委屈了我儿，这次妈妈可要好好犒劳你。”她跑前忙后为自己的英祥儿摊小麦面煎饼，为他变着花样炒菜吃。

她眼里再没有眼泪，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她指着囤里的麦子，锅里的大米，告诉英祥儿，红薯干已成了饲料，花生米还卖给外国人吃，你妈妈可赶上好日子了。

这次探家令郝英祥好欣慰。老妈妈的十多个孙辈都结了婚，四世同堂。还盖了新瓦房，添了新家具，日常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再也见不到黑乎乎的薯干煎饼了。郝英祥不禁默默祈祷：义昌，如果你地下有知，也会为老妈妈和全家人过上好日子而高兴吧！

郝英祥返回时，老妈妈给他带了十几斤花生米、十几斤花生油，还有好多白面煎饼和大葱。带这么多东西上路对一个二等伤残军人来说，无疑是个负担，但郝都欣然带上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食品，而是一片亲情，亲情是不可以回绝的。

郝英祥从工作岗位上离休，清闲下来，探望妈妈的愿望更强烈了，正巧女婿赴南方出差，他去探亲的愿望便又一次实现了。第三次来山东探家，是在郝英祥离休后的1994年。此次山东之行，他不再来去匆匆，为了膝前行孝，一住就是40多天，他要给87岁的母亲献上儿子的孝心。倾心相处的一个多月，他陪伴母亲左右，和她唠家常，给她做山西菜，帮她干家务活，用地排车拉她赶集，引得街人直夸老人家有福气。老妈妈虽然手脚已不灵便，但仍给儿子做面条、摊煎饼，可就是不给他吃饺子，他问为什么，妈妈笑着说山东风俗讲究饺子是捏死口的，吃饺子就把情意给捏断了；吃面条，常来常往，情意长存。老妈妈喊他二儿子，薛义昌的大哥、三弟称他“二弟、二哥”，晚辈们则呼他“二伯、二叔、二爷爷”，平日里，他和老妈妈拉家常，帮着做家务干农活，用地排车拉着87岁的老妈妈赶集，尽量弥补老人失去儿子的缺憾，尽一个儿子应尽的职责。老人一提起郝英祥对她的孝心，泪水就吧嗒吧嗒往下滴，并一再重复着一句话：“亲生儿子又能怎样？如果没有英祥儿安慰我，光想二儿子早就把我想死了，哪能活这么大年纪。”

郝英祥工作在机关，早些年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后来的离休工资也只有500多元，三个孩子，全家六口人，全靠他一人的工资。1982年，妻子病故，当时家中只有大女儿成了家，老母又身患乳腺癌瘫痪在床，家中一直处于困难状态。他是独子，没

有人能帮补他，1961年住上单位公房，直到此时还没有属于自己归宿的房产，家里是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陈设。

但就是在这种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少、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除了48年如一日写信在精神上慰藉烈士的母亲，还竭尽全力在物质上给老人家以帮助，表达儿子的心意。家庭负担十分沉重的他，拿不出很多钱抚养山东妈妈，但他每年都会给老人家寄些钱、买点日用品或扯一身布料。这些透着真情实意的钱物，对老妈妈来说，已是享受不尽了。几十年来，他给山东妈妈寄钱寄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寄去灯芯绒、肥皂，还几经周折买了毛哔叽、的确良，县委老干部局发福利品，他领了一根能照明的拐杖，当天就给妈妈寄去了；在北京出差，看到缎子被面，给妈妈买了一块；逢年过节，5元也寄，10元也寄，生活条件好转，又寄成30元、50元。受郝英祥影响，女儿、女婿也拿出工资让父亲给奶奶寄去。

他给山东最短的一封信中说“我现在很忙”，其实是生母病重，已在弥留之际，他整天服侍，没有告诉山东的妈妈，害怕她老人家挂念。就是这样，他还是抽空买了蓝、白两块布料寄给山东妈妈，还不忘叮咛一块“过年穿”，一块“夏天穿”。牵挂着妈妈，还不忘哥哥、弟弟和妹妹。哥哥当了村干部，他就寄去“小大衣”，弟弟中年丧妻，他就寄去毛呢中山服，20世纪50年代山东的妹妹结婚时，他寄去6双机线袜子和两块肥皂。要知道，这在当时的沂蒙山区还是稀罕物，妹妹把它做了嫁妆。

老妈妈住在偏僻的山村，更没啥好东西送给山西儿子。几十年来，只是每年逢年过节寄点花生米去，起先是1公斤，后来是2公斤、3公斤等，老妈妈知道儿子那里不种花生，儿子又爱吃花生。如今山西也能买到花生了，寄去的花生加上邮费比当地买的还贵。郝英祥让老妈妈不要寄了，她却一如以往年年寄——这是一片慈母心啊！

四、车祸之后

1999年5月底，已66岁的郝英祥从山东老家的来信中得知，92岁高龄的老妈妈因白内障已双目失明，身体虚弱，走路都十分困难。他想，眼下农村已到了三夏大忙季节，老妈妈肯定缺少人手照顾，便急不可待地于6月6日第四次来到山东服侍妈妈。山



西隰县的两名记者听说了这一动人故事，与他一起专程赶来采访。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6月8日，在郝英祥乘农用车送采访完准备返回的记者去车站时，因车祸造成右臂严重骨折，被送进了临沭县人民医院。

老妈妈听说了，心疼得几天几夜寝食不安，比自己受了伤还难受，非要儿孙带着她去医院探望不可。因身体条件不允许，大家不让她去，她就天天坐在家门口等待来自医院的消息。老妈妈听说缺住院费，急忙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3000元抚恤金从枕头下摸了出来。

老妈妈的儿孙们同样深感不安，你500，他800，为郝英祥凑足了6000元医疗费，并轮流到医院服侍郝英祥，为他喂药喂饭，端屎端尿。郝英祥仿佛又回到了1951年与薛义昌共同住院的那段岁月。

郝英祥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来了。他们在到医院看望父亲的同时，都先后带上礼品到50里外的徐庄看望了奶奶，与奶奶拉家常，为她拍照。老奶奶虽然看不到孙子、孙女的容貌，但却深切感受到了一股浓浓亲情，老泪抹了又抹。郝英祥的儿子表示，如果父亲以后因身体原因不能来了，他也要替父亲常来看望奶奶，因为他已从父亲几十年的言行中真切感受到：山东的奶奶就是自己的亲奶奶。

7月7日，整整住了一个月院的郝英祥打着绷带出院了。医生嘱咐他要继续用药，马上回山西家中休养。但面对30度的高温、农村不大卫生的环境、较差的医疗条件，他却执意要回到徐庄老妈妈身边再住十天半月的。他觉得，住院前他只在家住了两天，没亲够老妈妈，老妈妈也没亲够他。

在徐庄，笔者见到膀子上挂着绷带的郝英祥老人，当问他对这次探家受伤有何感想时，他说：“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左臂致残值得，这次为探母右臂撞断同样值得。”

谈及千山万水隔不断的母子情结、半个世纪抹不去的战友情谊，郝英祥真挚地说：“现在，那些活着的战友大多与我失去了联系。假如薛义昌活着的话，我们也许早就不联系了，也不会有这段情感和经历。但50年前薛义昌把自己18岁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和朝鲜人民。作为活着的人，这既是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烈士忠魂的一点告慰和对失去儿子的母亲的些许慰藉。”郝英祥用自己的满腔情怀，实践着几十年前许下的生死承诺。

2000年农历除夕凌晨，93岁的薛母无疾而终。当日，郝英祥携儿子踏上去山东的列车，为母亲披麻戴孝最后送别。2003年，郝英祥患胃癌，做手术当天，山东的三弟及侄儿、侄女、外甥赶赴隰县，在病榻前伺候郝英祥整整一个月。

2004年，郝英祥弥留之际，山东的薛家兄弟携后代来到隰县，3月12日，郝英祥病逝，山东的亲戚按隰县的风俗为他们的“二叔”“二大爷”扶柩送行。2014年，郝英祥去世10周年忌日，薛义昌的侄子和媳妇一同到了隰县，参加祭奠活动。至今，山西隰县的郝家后代和山东临沭县的薛家后裔仍来往不断，亲如一家……

伏击歼灭临郯苍汉奸宪兵队

孙怡录 黄秀成 陈玉波

1942年6月，伪临沂道尹公署顾问川本在临沂城内召开宪兵头头会议，策划部署反共剿共、破坏抗日力量的行动。川本的几个忠实走狗——临沂县宪兵队长王青一、郯城县宪兵队长杨保忠、邳县宪兵队长刘均（女）等，带着心腹特务参加密谋。散会后，王青一带领杨保忠、刘均等十余名特务奉川本之命到庄坞布置剿共行动。

我鲁南三专署公安局得到这一情报后，于凌晨渡过了沂河，在我地下党员和两面乡长张道彬的接应下，进入汤庄伪乡公所隐蔽起来。经过核查情报没变化后，公安人员又三三两两混杂在老百姓中躲过了敌人的盘查，进入了预定地点。

王青一、杨保忠、刘均等由于在会上受到了川本的褒奖，高兴得忘乎所以，带着十几个心腹骑着自行车，一路说笑，沿临（沂）马（头）公路向南而来。当中那一对趾高气扬的男女，就是叛变革命后当上临沂宪兵队长的王青一和他老婆。

提起宪兵队，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川本当上临沂道尹公署顾问后，丧心病狂地推行“以华治华”的反动策略，从临沂、郯城、苍山等地搜罗了一大批叛徒、地痞、流氓和坚决反共的地主子弟组成了庞大的宪兵队。川本又亲自挑选了37人，送到济南日本侵略军中进行特种特务训练。叛徒王青一、刘均和大汉奸杨保忠受训回来后，都当上了宪兵队长。宪兵队以川本为后台，可以随心所欲地以共产党八路军或私通共产党的罪名逮捕任何人，可以调集鬼子、汉奸进行扫荡，成了日本人豢养的一群疯狗。由于叛徒大都参加了宪兵队，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这天，没有一丝云彩，炎炎烈日高悬在当空。桥头村北的小路边，十几个农民正在烈日下辛勤耕作。远处，几个农民钻进密密的高粱地中打高粱叶；近处，几个农民正在给豆子地锄草松土，油黑的脊梁上淌着一条条亮亮的汗沟；还有几个农民在路边沟里割青草，并不时地抬起头来向路的尽头眺望。在油绿的豆子地中间隆起一座坟，坟前蹲着一个魁梧的汉子，下身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黑土布裤子，上身穿件破粗布衫，斗笠齐眉，目光炯炯。这中年汉子就是大名远扬的我鲁南三行署公安局长危益民。他用蒲扇般的大手拽着破布衫呼扇了两下，抹去鬓角的汗珠。随后，索性坐在地上，掏出旱烟袋悠然地抽起来。



十几个骄横的宪兵，簇拥着王青一进入了包围圈。站在坟头的危益民摘下了斗笠，扇了两下，发出了行动信号。在路边弯腰割草的农民突然飞起一脚，将走在最前面的自行车踹倒。第二辆、第三辆躲闪不及撞了上去，摔得“哎哟”直叫唤。后面的宪兵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一边骂着前边的蠢货，一边急忙刹闸停下车子。这时，在地里耕作的庄稼汉一起掏出了短枪，子弹象暴雨似的刮了过去，十余名宪兵立时毙命。王青一被活捉了。

王青一见是危益民，“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鼻涕眼泪一块流，口中反复唠叨“大叔，饶命，我这也是没办法……”

“把枪交出来！”危益民厉声说。

王青一只好将藏在怀里的狗牌撸子掏出来放在地上。王青一自知难以活命，两眼珠子偷偷四下打量，伺机逃走。

“走！”一个公安人员向王青一的屁股踢了一脚。王青一却借着向前扑的猛劲，顺势向豆子地里跑去。几个公安人员同时举起了短枪，危益民把手一摆，向前跨了一步喊道：“王青一，你不要跑！”作恶多端的王青一只恨爹娘给他少生两条腿，哪里肯听。眼看就要窜进高粱地了。危益民掏出匣子枪一甩手，一颗正义的子弹准确地从王青一后脑勺打进去，从眉心钻了出来。王青一翻了一下白眼，上了西天。

枪声大作。四周据点的鬼子汉奸气势汹汹地向桥头开来，子弹呼啸着从头顶上掠过。公安人员打扫了一下战场，带着战利品，推起汉奸们留下的自行车一蹶腿儿，走了。

几分钟后，鬼子汉奸赶到了出事地点，等待他们的只有十几具死尸。不知是感到自己下场不妙，还是悔恨来迟了，这些鬼子汉奸发疯似地把子弹射向四周茂密的高粱地。那高粱杆随风摇摆，叶子发出“吱吱”响声，像是耻笑这伙笨蛋。

从这以后，宪兵队害怕极了，行动更加狡猾诡秘。每走一段路，都要叫负责这段路的伪军、伪乡丁带路保驾，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然而，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危益民带领公安人员又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在短短的两个月，就消灭了28名高级特务和许多作恶多端的宪兵。到了1942底，川本组织的宪兵队就被打垮了。

铁军大帐追歌行 (八)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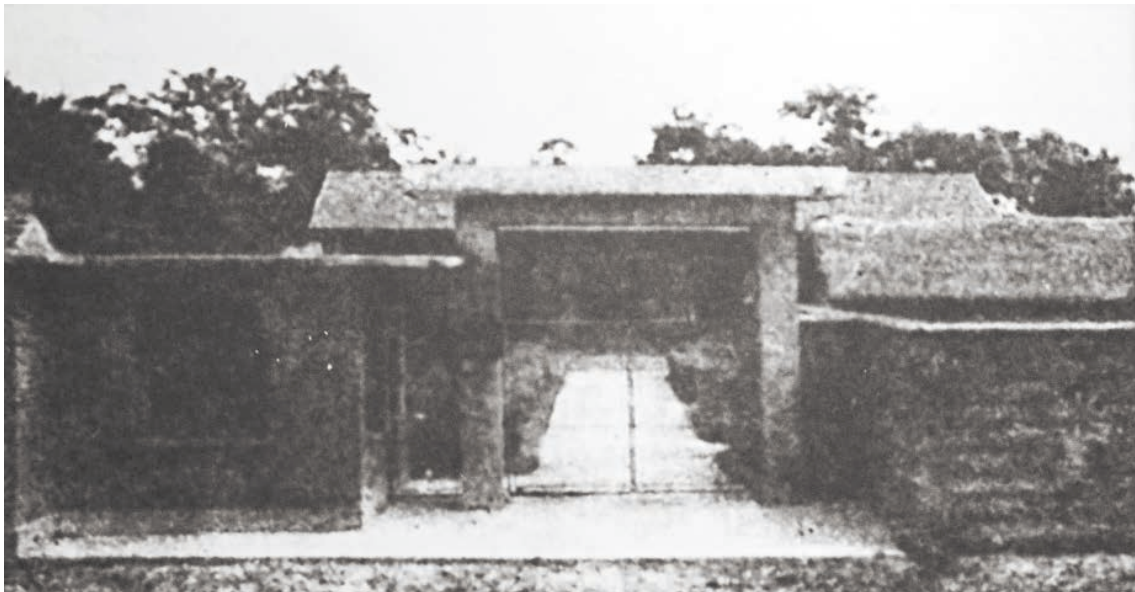
江苏盱眙——风云黄花塘

(1943年1月10日——1945年2月28日)

为粉碎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的第二次大“扫荡”，194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撤出阜宁县停翅港，向淮南转移。1943年1月10日，到达并长驻于江苏省盱眙县城东南方30多公里的黄花塘镇。

1941年新四军军部重建时，黄花塘是新四军第二师师部驻地。军部到来后，二师师部迁到了来安县的大刘郢村。

黄花塘战略上地处苏皖交界，南望金陵，北披洪泽，东指盐阜，西出皖东，又处于津浦路南段侧翼，既是敌所忽略的空隙地，又是连接苏北、苏中、皖北、皖东的中心点，战略机动空间大，条件好。具体地理位置，黄花塘西侧群山连绵，由北向南，牌坊、斗蓬、袁家、小焦、大西、老钹等大小山陵，并肩连膀，一字排开，似群卫列盾；东侧镇地四周，村庄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如众星拱月；池塘河渠如网似带，碧水长流，林荫掩映。镇之东侧，紧靠莲（塘）泥（沛）公路，便捷远出。据说，陈毅军长率军部到达此处后，环顾四周，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话：



黄花塘军部旧址原貌

“就这里了！”

村中原有一数百平米的池塘，原名“黄晖塘”，又名“黄昏塘”。无雨季节，池塘干涸，塘底如砥。新四军到此后，官兵们常于干涸池塘中运动、游艺、开会、操练。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军部首长带领大家将池塘深挖，接连河流，致使蓄水大增，四季不涸，为军民饮用。张云逸、罗炳辉提议将黄晖（昏）塘改名为“黄花塘”，黄花塘这个富于诗意的名称由此而来。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期间，军部直属各机关分散住于镇四周村庄，司令部在黄花塘庄西，政治部在大、小王庄，供给、卫生部在常庄等。军部代号为“黄河大队”，下属军直机关，则以“黄河大队某中队”顺序排列之。

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在继续领导全军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反顽军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整风、大生产、军政大整训，发展和巩固了苏、皖、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完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豫鄂边区发展成为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的战略区。1945年1月下旬，王震、王首道等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

1982年，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又被公布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纪念新四军军部暨中共中央华中局进驻黄花塘60周年，2002年在省委、省政府批准支持下，在军部旧址左前方约100米处，由县政府租用土地150亩，新建了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陈列历史图片资料1000余幅，展示革命文物200余件。旧址处还保留修葺或者依照原样复制了政治部、卫生部、淮海根据地食堂、2师军工部等单位，以及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等领导人的旧居。

一、自搭茅屋居长龙，黄花塘里唱大风

黄花塘村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来到村里后，都借住在乡亲家显然不可能。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军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泥土打墙，茅草苫顶，在村外为陈毅、饶漱石等首长和领导各自新盖了几间小草屋；四周植绿树，门前铺石径，俨然就建起了一处处小小的农家“小田园”。而在曾山同志的茅屋旧居前，他的夫人邓六金后来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前辈是怎样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就是这个小小的村庄和几处农家小田园，自华中局和军部进驻以后两年多时间，成为整个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一项项决策在这里作出，一道道军令从这里发出；胜利与发展的捷报与消息，一次次从华中大地、四面八方反馈汇报到这里。

在日寇、伪军、顽固派三面夹击的情况下，新四军军部所以能在小小黄花塘坚持两年多时间，是因为黄花塘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与条件：

其一，地理位置优越。黄花塘位于华中腹地，处在长江、淮河之间，东临大运河，西望大别山，是华北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相互联系的纽带地区，又是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中枢地区。加之该地扼津浦、淮南两铁路，而日军侵占津浦路南段后，因兵力不足，只能占据在沿线较大集镇上，无力深入地地形复杂的内地建立据点。铁路两侧20公里以外的广大农村均为我根据地，既便于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活动，又为我提供了较大空间的立足之地。

其二，群众基础好。盱眙是革命老区，1929年起就开始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盱眙人民拥护共产党，支持新四军，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在新四军军部到达之前的1942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和地下组织100多人，已经先期转移到了盱眙县境内、距黄花塘很近的顾家圩子。这些都为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常驻黄花塘创造和提供了可信赖、可依靠的社会环境。

其三，自然条件好。盱眙地属丘陵，东边有三河，西面有淮河；北面的洪泽湖地区，既有丘陵、山岗，又有平原、圩区，还有大片树林，可谓是天然屏障。黄花塘村距离盱眙县城约35公里，在村四周，新四军原驻守部队第二师构筑有较完整的作战工事，还有树林环绕。加之该地区属于湖泽鱼米之乡，物产丰饶，可为新四军进行抗战提供较为有力的后勤供给及其他保障。

其四，根据地巩固。新四军第二师及其前身第四、五支队东进后，在该地区长期坚持抗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区内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文化工作都有了长足发展，给军部常驻此地提供了有利的依托。

小小黄花塘，占尽天时地利，为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在此长久留住，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二、病榻之上挥风云，陈毅捉放韩德勤

军部来到黄花塘的第二天，陈毅便住进了二师医院，而且一住就是好长时间。由于长期紧张疲劳，加上时不时不可避免地着急上火，他的痔疮病发作了，这次犯得尤其厉害。

即便是有病在身、卧于病榻，陈毅仍然日夜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领导着根据地反“扫荡”和反顽斗争。

陈毅预料中的战事如期到来。1943年2月12日，日军抽调华北、华中部队的近2万兵力，南北夹击，开始对苏北地区进行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们运用老战法，“吃柿子先捡软的捏”，首先对国民党韩德勤部进行合击。韩部仍然怂包样，一触即溃，土崩瓦解，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几天内其所控地区全部沦入日军之手。

之后，日军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我根据地。从2月中旬到4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指挥第3师官兵，进行了殊死抵抗，发生了一起起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战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小沙东海面遭遇战”和“刘老庄保卫战”。

3月17日，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带领本师50多名干部，奉中央命令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从阜东县乘船经海路北上山东。不料第二天清晨，在小沙东海面与日军巡逻艇发生遭遇。战斗打响，彭雄率领大家据船死守，顽强还击，从清晨到傍晚，激战了12个小时，最后，彭雄与田守尧等不幸殉难。当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把这个消息电告给三师师长黄克诚时，大家为之震惊，沉痛万分。

3月18日，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在淮阴之北刘老庄执行就地牵制、阻击日军，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的艰巨任务。当时全连只有82名指战员，面对的是潮水般涌来的1000多名日伪军，敌我力量极为悬殊。但四连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长征的英雄连队。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接受战斗任务后，立即对全连指战员进行了紧急的战前动员。全连同志抱定必死决心，迅速进入了阻击阵地。面对十数倍于我的强敌，他们个个毫无畏惧，上来就给先行冲来的日军骑兵一个迎头痛击，打得他们人仰马翻。遭到阻击的日军像红了眼的疯狗，吼叫着一下全部围攻过来，又被四连一顿狂揍打退回去。连长白思才也身负重伤，一度

昏迷了过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大半天，近千名日军竟然没能突破四连的阵地一步。战至黄昏，四连指战员打退了敌人的5次进攻，多半指战员也已壮烈牺牲。剩下的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用完了，他们砸毁了多余的枪支，烧毁了地图和文件，准备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搏斗。就在此时，数百名敌军蜂拥而上。受伤的连长白思才咬牙挺立，与指导员李云鹏率领大家包括还有一口气的轻重伤员，一齐扑向敌群，与敌展开白刃肉搏战，刺刀挑，枪托捣，石头砸，牙齿咬，把敌人杀得鬼哭狼嚎、尸横遍地。最后，4连终因寡不敌众，除当时有1名战士重伤外，其余都在阵前壮烈牺牲。当地乡亲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那名奄奄一息的伤员，他身上共有3处枪眼，10多处刺刀伤痕，右臂也被炸断。十分可惜的是，虽然经过努力抢救，这名战士在第二天也不幸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一仗，4连不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让敌人付出了死伤170多人的代价。战后，当地群众收敛烈士的忠骸，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修建了“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和纪念碑，当时的苏北行署主任李一氓题写了碑文和挽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到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朱德总司令则称赞他们是“我军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后来，第三师重建四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

就在新四军拼死抗击日军大“扫荡”时，在抗日战场上一败涂地、落花流水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却黑着良心，不顾唾骂，又一次干起了偷鸡摸狗、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无耻勾当，在新四军背后施放冷枪暗箭。而陈毅则躺在病榻上，举重若轻、指挥若定，指挥导演了一出“捉放韩德勤”的反顽妙剧。

自1941年秋天，新四军在程子口战斗中取得反顽斗争的首次全胜、让韩德勤吃了一个大大苦头后，韩德勤似乎终于明白了新四军的厉害。此后，这个老顽固派老实了不少，甚至主动找上门来向新四军示好。出于抗战大局，新四军自然也给足了韩德勤面子，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后，老奸巨滑的韩德勤也得到了日军即将“扫荡”他



陈毅（左一）用牛车
送走俘虏的韩德勤
（左二）

的地盘兴化、曹甸、车桥的消息。被日军打得已成惊弓之鸟的韩德勤，生怕自己被日军“扫荡”殆尽，于1943年1月24日，派出潘良甫、梁国栋、徐义生3人为代表，携带他的亲笔信，到新四军三师师部寻求“合作”，要求新四军答应：如果日军“扫荡”，韩部可以转移到新四军的防区。黄克诚师长根据军部指示，同韩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如果日军“扫荡”韩部，新四军当配合作战，牵制敌人；韩部机关及部队困难时，可向约定的地区转移，但无论如何不得向约定外地区转移；在约定地区不得侵害地方政府机关及民众团体，“扫荡”结束即返原防；如日军“扫荡”新四军地区，韩部则可仍原地不动。

这个临时协议，充分显示了在关键时刻，新四军对合作抗战的诚意与大度。2月12日，在韩部代表离开时，黄克诚又专门给韩德信写了一封信，重述了双方达成的临时协议：

楚公副总座钧鉴：

潘、梁、徐三先生来，捧诵手谕，无限感佩。潘先生等在此数日，相谈甚欢。本拟屈留小住，奈情况紧张，不克如望。日来南北敌态均有变动，“扫荡”之机业已显露，兹本团结御侮之素衷，遵钧鉴之指示，仅同潘先生等约定反“扫荡”中职部所愿效力者如下……胜利将临，寇气正炽。吾公领导军政坚持敌后，职部员兵时深敬念。伏乞本中央团结抗战国策，不吝赐教，俾有遵循至禱。春寒料峭，珍重万千。端肃敬叩卫戍安。

职黄克诚敬叩

十二日

2月15日，黄克诚同时将以上电报原文发给了陈毅、饶漱石和延安的毛泽东、刘少奇。刘少奇回延安后继续负责和指导华中工作，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尤其是韩德勤有着“剥皮识骨”的了解，于是，在2月20日致电陈毅和黄克诚等，明确指示：“敌寇‘扫荡’韩德勤，韩部窜入我根据地，你们一面应给韩部好的照应，相机援助，以便改善关系；但你们绝不要放松警戒，应以有力部队监视他们，以便在‘扫荡’后使他们退回原防，不致占领我重要地区不退。这些部队是毫无信义的，你们必须留心，以免上当。”

事态发展果不出刘少奇之所料。

当日军“扫荡”韩德勤时，新四军信守承诺，积极配合韩部作战，向日伪频频出击，牵制敌人兵力。对转移实际是逃散到我根据地的韩部，新四军以友相待，提供庇护，收容送还，提供便利。期间并不遗余力，倾囊相助，发动各地群众热烈慰问，送粮肉款犒劳。新四军的仁义之举，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和韩部官兵的感激，韩德勤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对他们的配合与援助。但是，韩德勤却狼性不改，转眼无恩，自食其言，反咬一口。在围攻其部的日军转向我新四军时，不但不“即返原防”，反而趁火打劫、助纣为虐。

3月初，韩指使部下先行抢占了苏北淮海区的里仁、程道口等要地；3月中旬，韩德勤得寸进尺，又抢占了苏北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山子头、界头镇、金锁镇一带。侵占我根据地后，韩部有的恶习不改，凶相毕露，任意破坏骚扰，到处抢劫强奸，甚至公然逮捕扣押根据地地方干部，强缴地方武装枪械，杀害新四军伤员，并企图委任他们的所谓“区长”“乡长”等以为爪牙。之后，韩又命部继续西进，与正在东进我苏北根据地的汤恩伯部副总司令王仲廉会合。此时，韩德勤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与汤部合流，抢占苏北，进而图谋整个苏北，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并趁日军对我盐阜区进行大“扫荡”之时，狼狈为奸，对我进行夹击，从而一举歼灭。对此，我方从一开就对韩德勤提出多次交涉、劝告进而警告，但韩一概置若罔

闻，一意孤行。

淮北是华中根据地的西大门，是连结华北、华中的纽带，战略地位至为重要。如果韩、汤部阴谋得逞，不仅我华中党与新四军失去立足之地，而且我们用数年生命与鲜血打拼下的根据地也将大部丧失。

此时，日军对我盐阜地区历时月余的大“扫荡”已成强弩之末，开始铩羽而归；我军可以腾手出再次收拾韩顽了。历来讲究仁义礼智信又疾恶如仇、眼中容不得沙子的陈毅，终于雷霆爆发，当机立断：以牙还牙，文的不行，就用武力解决，用枪杆子把韩德勤驱逐出去！

3月14日，军部向各部发出预先战斗号令：“为击破顽韩在洪泽湖边建立根据地之企图，并粉碎王仲廉之东进，巩固我现阵地计，第4师主力及二师五旅、三师七旅与淮海军分区部队归第4师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歼灭该顽。”

3月15日，陈毅接到周恩来自重庆发来的电报，告知“蒋介石已令韩德勤、王仲廉东西夹击新四军，企图把新四军消灭在洪泽湖畔。”这更加证明了陈毅的判断与决策是正确的，也坚定了陈毅坚决回击韩顽的决心。于是，军部正式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各部于16日开始行动，17日晚间发起攻击，并规定了具体的战役组织部署。

随后，陈毅等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进行此次战役的意见作了汇报。

第4师接到命令后，迅速召集各部，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决定首先进行山子头战役。山子头位于洪泽湖东北侧的“连体姊妹湖”——成子湖西北岸，是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丘陵土岗。韩德勤的总部，还有在程道口反顽战斗中侥幸逃跑的王光夏所属第3纵队，分别盘踞在土岗上的几个村庄中。

17日下午黄昏，我各部队按军部命令进入战斗位置，准备于24时发起进攻。对专打内战的韩顽早已义愤填膺的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只等首长一声令下。

担任主攻的是九旅韦国清部，任务是歼灭韩德勤总部及其第三纵队。但是在兵力上，九旅却明显不占优势。九旅参战的只有两个团，而韩德勤除了两个团外，还有总部和纵队部的直属及警卫部队。而且师首长命令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打成对峙。韦国清与其他旅首长仔细商议，决定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以小部兵力牵制敌人，集中大部兵力歼灭韩德勤及其三纵的总部和主力。

晚12时，战斗准时打响。九旅指战员如呼啸山林的群虎，旋风般冲向顽军。毫无防备的顽军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懵头转向，许多人还在睡梦中就当俘虏。韩德勤总部设在王圩村一个地主庄园中，房院坚固，易守难攻。我指战员首先用猛烈的机枪火力严密地封锁住大门，再由部分战士爬上屋顶，居高临下向院里射击投弹。等顽军们龟缩进屋内，又在屋顶上扒开几个洞，向屋内投掷手榴弹，直打得顽军鬼哭狼嚎、无路可遁，活命的只得乖乖地举着双手跑到外面投降。韩德勤和王光夏两个贼首还赖在屋内，战士们一拥而上，冲进屋内。王光夏这个双手沾满苏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还要举枪顽抗，被当场击毙，韩德勤则战战兢兢地缴枪投降，再次当了俘虏。

九旅的主攻战斗，进行到18日凌晨4时，胜利结束。其他各部的进攻也都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到18日下午3时，战斗全部结束。新四军共歼灭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及保安第三纵队、独立第六旅1000余人，生擒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参谋长吕汉卿等，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襄。

韩德勤似乎特别嗜好、乐此不彼地给共产党做俘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率部“围剿”红军，结果在红军俘虏营中先后“二进宫”。第一次将他擒拿的正是陈毅的部队。虽然韩德勤位居师长，但是共产

党优待俘虏、平等对待的政策，放了他一条生路。第二次又被我活捉，在部下相救下逃生。这次，他又成了陈毅手中的俘虏，非苟活偷生、特别厚颜无耻之辈，可能早就为他们的蒋委员长“杀身成仁”了。

但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被我生擒的这个身居高职又专打内战的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却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烫手山芋。如何处理“俘虏”身份的韩德勤，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恰恰是足智多谋的陈毅，把这个重大敏感的问题，处理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

早在战役开始前，陈毅在部署战术、策略时，就对各部提出：在战斗中，王光夏、李仲寰如负隅顽抗，可以击毙；对韩德勤则不能打死，如果在俘虏群中发现韩德勤，可有意制造空隙让他逃走。

17日午夜战斗打响后，鼓雪枫、邓子恢致电军部，报告战况。军部复电并上报军委，提出了对韩德勤的处理意见：

彭、邓并军委：

十八日三时电告战况已悉，请作如下处理：

一、对韩德勤本人可佯装不知，但应与一部分中上级军官一道优待，一道释放，并严防其自杀和对外自认。

二、对一般俘虏可开欢送会，优发旅费，遣送回路西，并派人作诚恳的解释和宣传（内容照下述）。

三、我们宣传措辞，专责王光夏破坏黄、韩协定，停留运河两岸及洪泽湖沿岸，制造摩擦，并欲趁大军东进时一鼓歼灭本军，本军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四、对韩一面装着不认识，一面将王光夏搞摩擦予以说明，一面又须将韩、王等大军东进欲消灭我军的阴谋予以揭露，使俘虏官兵均能明白此点，谅解我之立场，转而引起对韩、王之不满。

五、战役应迅速处置和转移。

六、对韩俘放事，对内、对外应守秘密。

陈、饶、张、赖
巧十时

韩德勤被俘后，我指战员在清点俘虏时其实已经认出了他而佯作不知，他对自己的身份开始也予以否认。本来他可以顺水推舟地与其他俘虏一起“体面”地溜之大吉，但就在准备走人的一刹那，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韩德勤虚伪而胆怯，要脸更要命，心想：放出去后，要是发生了不测与危险怎么办？平时自己身边前拥后呼，可现在谁来保护他一个俘虏的安全？他越想越怕，干脆把腰一直，不打自招：“我就是韩德勤，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我要面见彭雪枫和邓子恢！”

这下，反倒使我战士们没了主张，只好逐级请示到旅里。韦国清迅速赶到现场，确定这个自称为韩省长的人不是个膺品，也没亮明自己的身份，随即命人把韩直接送往师部。

四师师部当时设在洪泽湖西岸的半城镇。当天，韩德勤被押送到后，脑子突然发烧，竟然首先表演了一出“杀身成仁”的闹剧，连续吃下了十几个火柴头，接着开始绝食，还写下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所谓遗嘱，丑态毕露，令人作呕。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先出面与之谈话，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说着自己这些年的“功劳”与委屈，但就是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上，彭雪枫师长来看他，并劝他先吃饭再谈话，饥饿难捱的韩德勤才假惺惺地开吃。

演完了自杀闹剧，又填饱了肚皮，韩德勤马上又来了威风，摆出了长官架子，

责问新四军为什么打他。彭雪枫和大家并不惧怕他的色厉内荏，摆实事，讲道理，一一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专事制造摩擦、破坏合作抗战的罪行，直把韩德勤说得从张口结舌到哑口无言。无奈，他提出要见陈毅军长。

3月18日当天，陈毅即接到了四师关于韩德勤被俘并自供的报告，为稳妥起见，他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军委，并请示：“如何处理？请即电示。”闻听韩德勤要面见自己，陈毅处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忍着病疼折磨，于24日傍晚，从军部黄花塘出发，乘船夜渡洪泽湖，朝四师师部飞舟而来。

初春的洪泽湖，万顷碧波，水光潋滟，鹭翔凫游，鱼跃鹰潜。夕阳映照，红霞漫天，渔舟晚归，两岸炊烟。自从这次反“扫荡”以来，军部转移，身缠痼疾，敌寇紧逼，顽军掠地，内忧外患，四面夹击。陈毅宵衣旰食，朝乾夕惕，殚精竭虑，心无二用，一直处于高度紧张、高速运转的状态之中。现在，“扫荡”退潮，顽首被擒，陈毅终于可以喘口气了。面对湖色天景，心情格外轻松，诗人将军不由诗意大发。轻舟如燕，披星戴月，朝露初起，即达彼岸，在陈毅一向金戈铁马、雄壮豪迈的诗风中，难得一见的一首风景诗《过洪泽湖》也提笔挥就。

陈毅来到四师师部，并未立即会见韩德勤，一是故意冷落一下韩德勤，让他知道德行不良的“上司”想见下属也不是轻易而举之事。二是更仔细周全地考虑一下此事如何解决为最佳。在听取了大家汇报后，陈毅认为：如果杀掉韩德勤，蒋介石必让汤恩伯取而代之，顽敌仍存且汤顽实力相对较强，后患不已。留下韩顽一命，他为守住自己的地盘，不会鼓动蒋介石派汤恩伯“鸠占鹊巢”，且韩已无多大实力，对我威胁与危害较轻。汤恩伯如得不到江苏省主席之职，就不会再积极东进。同时，现在放韩，能使事态局部化，在政治上、大局上于我有利。而且，韩贪生怕死，最怕我们杀之，如见我不杀，今后对我亦能有所顾忌。因此，陈毅最后果断决策：与韩之争，“私了”为上，应尽快放韩。

25日，陈毅电告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为上策，以便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且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如何，请示，以速为妙。”陈毅主张尽快放韩，礼送出境。

26日，中央尚未答复，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先回了复电：“我们主张暂不释韩。”

27日，陈毅又连续两次给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发电，并再次报告中央，重申放韩的理由，并特别说明：“韩德勤被俘事，估计尚未曾传出去。”

忐忑不安、做贼心虚的韩德勤却更加沉不住气了。28日，当彭雪枫、邓子恢再次与其谈话时，他彻底放下了架子，先是像个嫌犯，供认这次事件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才引起新四军“问罪”；再又如同怨妇，一再诉说自己的“苦衷”，言称汤恩伯对他有“加害之意”，蒋介石的反共方针不变、自己“难守诺言”云云；最后更像个乞丐，腆着脸皮，向我方提出给他留条命、“给出路”的请求；又如同当今不要残羹剩饭而要现钞的“贵族乞丐”一样，请求我方给他“留面子”，保住江苏省主席“宝座”等，实则可悲又可笑。

29日，中央书记处终于回电张云逸、饶漱石并转陈毅：“陈27日两电悉。同意陈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为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无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一个密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陈毅见时机成熟，在30日会见了韩德勤。韩德勤如同终于来了救星，急忙出迎。陈毅先是很礼貌地向韩表示了一番“慰问”，然后像先生开课一样，向韩德勤再次讲了此次山子头事件的由来，阐明我党我军团结抗战的主张，最后还给韩德勤

吃了一颗定心丸，表示：只要你韩主席坚持抗战，即便将来局面演变，不幸有大规模的摩擦事件发生，我们也力求与韩主席保持友善，不受大局牵累。

陈毅不计前嫌、一笑泯仇的大度胸怀和真诚合作、共同抗日的态度，让韩德勤不得不表现出了一点悔意，他承认并表示道：“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但当他检讨起自己从黄桥起到这次山子头事件的问题时，却不似检讨而更像说书艺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最后，他还提出为了表示信守这次合作之意，愿意订立文件，双方合影留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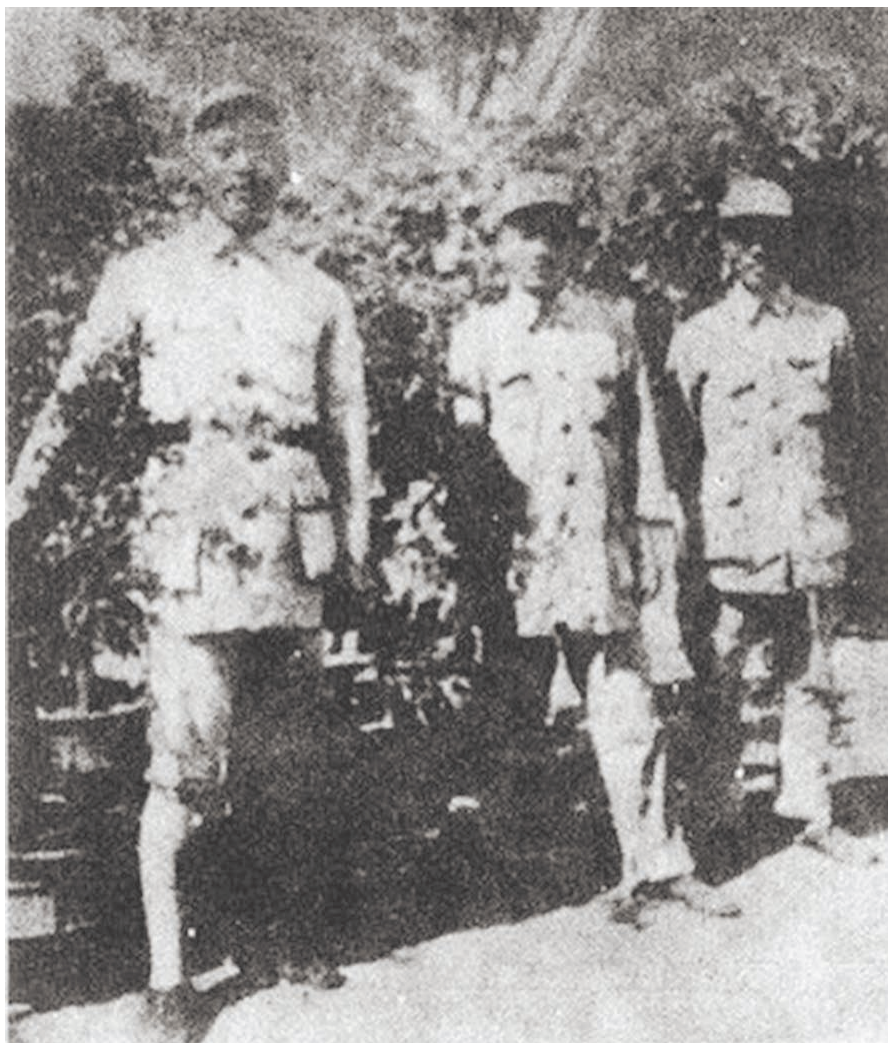
4月1日，韩德勤“屈尊”回拜陈毅，陈毅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在攻打新四军时不惜一掷千金、此时却输得分文不名的韩大“主席”，竟然厚着脸皮向新四军“借钱”作个盘缠。陈毅不能让“省主席”显得太寒酸，出手爽快大方，给了韩8万元，并送还了他的手枪、手表等战利品，还给了韩部分电台、机枪、官兵等，给他腾出了一些地盘。饭后，在我骑兵队的护送下，韩德勤坐着陈毅为他准备好的牛车，带着部分人枪上了路。

当天，根据双方商定，韩德勤以其参谋长吕汉卿为代表，新四军以彭雪枫为代表，共同协商签定一个合作抗战的协定：《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副总司令会谈备忘录10条》，这是韩德勤私下与新四军达成的秘密协议，所以第10条特别规定：“本条款双方均应绝对保守秘密，未得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片面废弃或泄露公布。”此协议报陈、韩核准，由陈、韩互换信件以示同意。

后来实践证明，陈毅指挥新四军坚决进行山子头反顽战役和捉放韩德勤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使得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对进、合击新四军的阴谋破产。时间不久，韩德勤便把自己的副总部和省政府搬到了安徽阜阳，到安徽地盘上去当了他的“江苏省主席”。从此之后，国民党的反共大军也未敢再东进。

周纯全：阴影伴随一生

靖一民



1940年7月周纯全与刘浩天、阎捷三在抗大一分校

发生在1941年11月的“大青山突围战”，是一场气壮山河的著名战斗。可在漫长的岁月里，国内的重要媒体却极少介绍那场悲壮的战史。究其原因，除了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战役，不易多宣传”之外，还与一个人物有关，他就是“大青山突围战”的主要指挥者周纯全。

周纯全出生于1905年，父母都是湖北红安的贫农。16岁时，他在汉口当过织布工人，参加过工人运动，后从军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职务。1935年，在长征途中，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的职业军人中，只有朱德总司令是政治局委员，可见他当时已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可就是这位战功卓著的“独眼战将”（右眼在战斗中受伤失明），却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从中央领导人的名单中抹去，以至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上将，媒体上也极少宣传他的功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翻阅尘封的史料才发现，周纯全是一位有阴影的人。1931年9月，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红四军4个师全部移驻光山县的白雀园，进行内部整肃，开始捕杀所谓“改组派”分子。而整肃的主要任务则由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具体执行，当时兼任该局局长的正是周纯全。

周纯全是一位淳朴的工农干部，他对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无比敬仰，只要是张国焘的决策，不论对错，他都坚决执行。张国焘对这位闭着眼睛追随自己的战将，自然也很欣赏。当他另立中央时，就给周纯全封了一系列重要职务，足见张国焘对周纯全是何等重视。这一次“肃反”，张国焘一声令下，周纯全便带着保卫局的人到处抓人，处决了一大批指战员和知识分子，凡是张国焘看不顺眼的都在可杀之列。根据党史和民政部门后来的粗略统计，“肃反”时，红军被害的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至于团以下的被害干部，更是达数千人之多，当时担任班、排长的，基本都被捕杀，就连高级将领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未能幸免，被刑讯逼供后惨遭杀害。后来徐向前曾悲愤地质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不得不实话实说：“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由此可见，白雀园的大“肃反”，并非是红军中真出了反革命分子，而是张国焘在清除异己。

在大“肃反”的日子里，周纯全像是换了一个人，只要张国焘不喜欢的人，他都有办法查出问题。一时间，根据地的人都说周纯全是中国的叶索夫（叶索夫曾主持苏联的“肃反”运动，当时苏共中央有委员和候补委员139人，竟然被他捕杀了98人），唯恐被他盯上。好在，周纯全很快认识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和搞“肃反”是错误的，他在劝说张国焘改弦易辙无效的情况下，明智地找到周恩来作检讨，并主动与张国焘决裂，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安心到抗大学习。中央见他态度诚恳，没有深究他的错误，而是免去了他的职务，让他成为抗大的一名普通学员。但从此之后，他成为一个有阴影的人，再无机会进入最高领导层。

一尺华丽，三寸忧伤。周纯全因为享受了不应有的体面、风光、荣耀，所以他必须经受不一般的屈辱、难堪、苦闷来偿还。他的人生开始走入低谷，如果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就会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

其实，周纯全除了因为愚忠，跟随张国焘在“肃反”中犯了错误之外，总体上讲他还是一位不可多得优秀将领。他作战英勇，足智多谋，指挥果断，在白雀园“肃反”之前，已屡立战功。在长征途中，有一次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他的帽子，他的额头上也被烧焦了一块皮，但他仍坚守阵地，沉着应战，硬是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追击。在红军向川北进军的途中，过汉江时正值天气寒冷的二月，战士们因怕冷不愿涉水过江。但当时敌人就快追到江边了，又无船摆渡，情急之下，周纯全第一个跳入了冰冷的汉江。战士们见首长都涉水抢渡了，也都纷纷跳入水中，跟在周纯全的后面渡过汉江，甩掉了敌人的追击。作为高级指挥官，长征时他是有马骑的。可他总是让自己的战马驮着病号、枪支或背包，自己很少骑在上面。甚至，他还把唯一的一双布鞋脱给赤脚前行的战士穿，自己则让警卫员找来几块破布，加上

稻草，将双脚包住，用草绑紧，与战士们一走就是200多里路……正因他能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部队，所以他的威望很高，只要是他指挥的战斗，几乎都是战无不胜！这样的一位战将，即便是犯了错误，也会谨慎使用的。

果然，1938年末，周纯全被任命为抗大一分校副校长。不久，就升任校长。周纯全刚刚担任校长便接到上级的命令，让他率领着2000余名学员由山西省黎城县的西井镇，长途跋涉，迁移到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驻扎在大青山腹地。

抗大一分校来沂蒙后不久，日军就调集了5.3万兵力，对沂蒙山区形成了“铁壁合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大“扫荡”。因为抗大一分校的学员缺少战斗力（全校只有100多支枪，且子弹稀缺），1941年深冬，山东分局领导安排抗大一分校的人员暂时到泰莱山区躲避日军。不久，因为所获情报不准，误判大青山一带无日军，他们又根据上级的指示重返大青山。结果，被大批日军包围，陷入了绝境。

当时的大青山，南、北、东已被5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西边则由汉奸刘黑七的新编三十六师负责堵截。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周纯全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一边让战斗力相对较强的第一、五大队誓死阻止日军的进攻，一边指挥学员们向西突围。因为，只要能过了西面的大沙河就安全了。

本来，凭着周纯全智勇双全的指挥才能，是能够带领抗大一分校的大部分人员突出重围的，可没想到刚到一个叫李行沟的地方，他们就遇上了3000余名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和一一五师的机关人员。这些人与抗大一分校的人员一样，也是因为缺少战斗力，首长们才让他们到大青山与抗大一分校汇合，想以此避开强敌的。他们汇合后，周纯全安排机关人员先撤退，他负责带领部分抗大学员打掩护。可带领机关人员来的一位参谋却不服从周纯全的指挥，擅自决定全体人员留下与敌决战，造成了严重伤亡。

一一五师司令部五科科长袁仲贤见再这样打下去会全军覆灭，不顾那位参谋的阻拦，告诉周纯全：他们在来大青山时，山东分局的领导曾嘱咐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让他带着这3000余人与抗大一分校汇合后，所有人员都必须听从周纯全的指挥。只是，陈明在半道上壮烈牺牲，那位参谋接任指挥权后，没有及时向周纯全传达分局领导的指示精神。周纯全听后，愤怒地命令警卫人员把那位参谋绑了，然后留下少量人员跟随他打阻击，其余人员由袁仲贤带领着向西蒙山突围。他甚至宣布，如果实在突围不出去，也可以各自找地方暂时躲藏。

由于贻误了最佳突围时间，敌人已经逼近了突围人员。所以，在向西突围的途中，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著名国际友人、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本是到沂蒙抗日根据地采访的，却也参加了大青山战斗。在突围时，他见自己的翻译和警卫员都已牺牲，绝望之中，他不愿做日本人的俘虏，服毒自杀身亡。

撤退时，枪声一响，队伍就乱了，大家四散而逃，但大部分人员还是在继续往西突围。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正跟随队伍奔跑着，突然感到有人狠推了她一把，她不知道自己中弹了，只是本能地往前跑。但跑着跑着，她的脚步就慢了下来，身体直往下坠，不得不瘫坐在地上。等到她能站起来时，她藏到一间篱笆草房里可还是被汉奸抓住，押到了一个据点。她借去厨房找水喝之机，摸起菜刀砍向了自己的脖子。

姊妹剧团的指导员甄磊已经怀孕7个月，在突围的途中突然要早产，战友们只好带着她改变突围的方向，想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生产。可这群女兵还是被敌人盯上了，追击到猫头山上时，甄磊见甩不掉敌人，就命令女战士们进入黑松林逃命，她

自己则留下来打掩护。战友们不忍心丢下要生产的甄磊，可她却说：“反正我也跑不动了，不能再拖累大家。你们快逃命去吧！”战友们走后，她在打死了几个敌人后，自己也被鬼子残忍地杀害了。

还有20多名女战士，躲进了三间茅草屋里，凭着仅有的几枚无把小手榴弹阻挡着鬼子的进攻。鬼子进不了屋，就在附近的山坡上架起机枪，对准房屋的门窗射击，然后又朝屋里投了很多手榴弹。这20多位年轻的女战士，全部壮烈殉国……

而周纯全和留下打阻击的人一直坚持到打完了全部子弹，才凭着8颗手榴弹与敌人巧妙周旋，撤出了阵地，去追赶大部队。当他们来到大沙河时，见数千人都被刘黑七的队伍堵在河东岸，正不知该怎么办。周纯全见此情景，立即组织了300名有枪械的指战员，由抗大一分校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带队，在前面打冲锋。实际上，这300人就是敢死队，因为周纯全给他们下了死命令：就是打的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不准往回跑！这300壮士没辜负周纯全的期望，他们硬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行冲过宽阔的河面，在河西岸撕开一条生路，让3000余名突围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大青山突围战到底牺牲了多少人？据当时出版的《大众日报》报道，殉国者只有300余人。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参加突围的有5000多人，只突围出了3000余人，如果是仅牺牲了300多人，那缺少的1000余人怎么解释？很显然，阵亡人员肯定不止300多人。可为什么要隐瞒阵亡人数呢？那是因为打扫战场时，只找到了300多具指战员的遗体，其他失踪者生死不明，也就没列入阵亡名单。同时，也担心过多公布阵亡人数，会影响根据地的抗日士气，所以在公开报道时，才有了“牺牲300余人”之说。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没有必要责备先辈们不如实公布某些历史真相，他们那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在非常时期，有时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探讨历史真相，却不必再指责那些撒谎的人！

在大青山战斗结束半个多世纪后，曾参加过这场突围战的抗大老战士叶尚志



1939年周纯全与韦国清、左权、何长工、黄欧东等在晋东南太行山区

(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终于透露出了准确的阵亡人数。他在《重访大青山突围战场》一文中说：“这次大青山突围战，除大批伤员不计外，仅在主战场李行沟牺牲的烈士就有600多人，梧桐沟牺牲的有200多人，在东边二团战场和散在各处牺牲的也有200多人。其中抗大壮烈牺牲的指战员（都是干部）200余人，总共各部牺牲的烈士千余人。”叶老所说得阵亡人数基本准确，所以1997年临沂市委、市政府和费县县委、县政府在大青山纪念地立碑时，采用了他提供的数字，碑文上说，大青山战役牺牲了“近千人”。

或许有人会质疑，一场战斗牺牲了这么多人，作为总指挥的周纯全，他有什么功绩可言？事实是，如果没有周纯全的指挥，这5000多人一个也别想跑出来。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些曾参加过大青山战斗的人说的。这场突围战伤亡的确很惨重，却以1000余人的牺牲换来了3000余人的成功突围，保护了三大领导机关和抗大学员的安全，而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高级领导人，这就是大青山突围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才说周纯全又为人民立下了新的战功。可他是一个有阴影的人，当时没有人及时肯定这次战役的重要意义，更无媒体宣传他在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1947年9月，周纯全被任命为东北部队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1948年，他正式就任野战军后勤部长，完成了辽沈、平津、渡江和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任务；1950年冬，他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指挥员，负责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1951年5月，志愿军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兼任后勤司令，周纯全为政委。由于他在后勤岗位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朝鲜方面特授予他“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第一副政委；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周纯全的任职情况看，他的后半生，似乎是并没因那个甩不掉的阴影受太大的影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每到关键时刻，那个无形的“阴影”就会出现。他在担任总后第一副部长兼第一副政委时，总后部长由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兼任，政委一职一直空缺，由周纯全主持总后的全面工作。看起来，他似乎有希望升任政委一职，但不久他就被调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这仅是一个虚衔，后虽被任命为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仍然不能算是重用。如今细细分析，他新中国成立后的不能“再进步”，大约都与曾经的“阴影”有关。

周纯全深深懂得，人生的路只能一直往前走，哪怕是遇到了风和雨，也应有勇气去面对。因此，对于仕途上的落寞他并不在意，但他晚年最痛苦的是，他忘不了埋葬在大青山上的战友，还有遗失在沂蒙山区的一双儿女。周纯全的夫人名叫郑竖岩，是抗大一分校女生队的队长。他们在沂蒙期间，曾生有一儿一女。但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他们无法照顾孩子，只好将两个孩子送到山里一户老乡家临时寄养。可半年后郑竖岩去寻找孩子时，那家主人却告诉她：女儿已病死，儿子也饿死了。实际上，两个孩子都没死，是人家与孩子有了感情，不想把孩子还给他们了。郑竖岩为此哭了几夭，周纯全只好安慰她说：“他们既然不愿给咱，说明他们是爱这两个孩子的。”他虽然嘴上这样说，可心里还是不舍得这两个孩子，每每想起孩子，他都会无比伤心。直到晚年，他仍对自己的儿子说：“你的姐姐、哥哥还生活在沂蒙，我活着不能陪他们，死了也要去找他们！”

1973年夏天，叶尚志到北京探望瘫痪在床的周纯全，那时周纯全已基本失语。但当两位老战友回忆起大青山突围战时，周纯全竟然激动地啜嚅着嘴，突然迸发出“大青山”3个字。由此可以知道，大青山战役在他的心里有多么重的份量！后来，他病重住院，总是让护士将他的头调整到朝着大青山的方向，护士不理解，可他的家人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那里长眠着他众多亲密的战友，还有他的一双儿女也生活



在那个偏远的山区里。所以，他的家人总是让护士积极配合，尽量满足这位老将军的愿望。

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他的骨灰被分别撒进滚滚长江和他的家乡红安。此后，他的儿子周宏林总感觉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完成，等到他的母亲郑竖岩也去世之后，周宏林便带着父亲获得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母亲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来到大青山，将这两枚珍贵的勋章捐赠给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他深情地对当地领导说：“这两枚勋章回到了大青山，就如同我父母又回到了这里。他们又能与战友和沂蒙乡亲在一起了！”

是的，周纯全又回来了。这位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并在另一个国家的民族卫国战争中建立过功勋的将军，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回到了他的那些为国殉难的战友中间。尽管他曾是一个有阴影的人，但因为战功卓著，党和人民最终还是原谅了他，给予了他公正的评价。2007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一书，不仅详细介绍了他的卓越战功，而且肯定了他的杰出贡献；而沂蒙人民为了铭记他的丰功伟绩，则在大青山上为他树立起了一尊高大的塑像！



萧衍：爱做和尚的皇帝_(下)

我爱看历史



梁武帝

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同泰寺建成后，又在皇宫跟同泰寺对着的地方开了一个门，取名大通门。这样一来，他出宫入庙来来往往可就方便多了。这一年三月，梁武帝对文武大臣们说：自己要到同泰寺里当和尚。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梁武帝真的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了同泰寺。在同泰寺里，梁武帝每天不但晨钟暮鼓念经文，还要和寺内僧众一样打扫佛殿，和真和尚一模一样。

满朝文武大臣急坏了，他们一起到了同泰寺，给这位和尚皇帝跪了一

地，又是磕头又是央求，请他回宫。梁武帝开头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点了头。

为了统治全国僧尼，梁武帝敕命法超为都邑僧正（首都僧官，总管建康僧侣），以法云为大僧正（最高僧官，总管全国僧侣），要法超制定《要律仪》，命法正创立僧尼规诫。他又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蔬食（素食）主张。他不但禁食酒、鱼、肉，改行素食，还禁杀众生。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百户虫命，经亦说有八十万万户虫，若断一众生生命，即是断八百户虫命。”他还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强制实行素食制度。

佛教本来并不主张绝对素食，佛戒只规定“不杀生”，并未规定“不食肉”。无论是居家的佛教信徒所受的“五戒”，还是出家的“沙弥十戒”和“比丘二五五十戒”都未禁止食肉。梁武帝在其所撰《断酒肉文》里向僧尼们说，他之所以要僧尼们蔬食，乃是为了能使大家“远离地狱”，得好果报，所以，“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梁武帝崇佛，不但要求广大僧众禁断肉食，而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在同泰寺“舍身”时，他独对青灯古佛，“刺血经书，坐禅不食”，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即便在寺院当和尚，他也能“勤于政务”“孜孜不怠”。他每天四更天便起床，念完早课，便对着烛光批阅奏章，很多诏令都是他亲手写成的。

梁武帝还把他在寺院的清规戒律的生活作风推广到皇宫内部。他下令，织锦花纹不得用仙人鸟兽形状，以免裁剪有失仁恕。这位皇帝每逢礼佛，都身着“乾陀袈裟”，他的臣子上奏表，亦称其为“皇帝菩萨”。

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梁武帝在同泰寺里举行了一次佛教的大典，叫做“四部无遮大会”。“四部”指的是和尚、尼姑、善男、信女；“无遮”就是没有阻隔的意思。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谁都可以参加这次大会。梁武帝也身穿袈裟，口念佛号，带着一批大臣前来拜佛。他拜完了佛，又犯了当和尚的瘾，说这回非要当和尚不可，不愿回宫去了。当晚，梁武帝便住在同泰寺里。第二天，他到佛堂上开讲《涅槃经》。大臣们又急坏了，劝梁武帝回宫，去了一次又一次，结果全白费功夫。还是老办法，公卿以下群臣出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方才于十月还宫。

第三次“舍身”，与第二次“舍身”相隔15年之久。

第四次“舍身”时，梁武帝已是84岁高龄。

就在梁武帝最后一次从同泰寺赎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突然发生火灾，大火把佛塔烧毁了。梁武帝说这是魔鬼干的坏事，应该做更大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他下诏重建佛塔，把新塔修得比旧塔高一倍，才能镇得住魔鬼。但是，新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

病饿而死

547年三月，有一个叫侯景的东魏大将派人前来接洽投降。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出身镇兵，后因功渐升为镇功曹使。东魏大丞相高欢生长于怀朔镇，与侯景早就相识，两人关系甚好。北魏末年北方大乱，豪杰并起，侯景归顺尔朱荣，甚见信重。尔朱荣率军镇压葛荣起义，侯景担任先锋，生擒义军首领葛荣，

以功擢升定州刺史，由此显名。后来，高欢灭尔朱氏，侯景因与高欢有旧谊，又归附高欢，任大丞相长史，仍兼定州刺史。

侯景身高不满七尺，上长下短，广额高颧，右脚患有足疾，是个跛子，弓马非其所长。他虽然其貌不扬，却颇有谋略，以机诈多变著称。在东魏和西魏的征战中，侯景屡建战功，渐次进封为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河南道的最高行政长官），统兵十万，专制河南（黄河以南地区）达14年之久，是东魏实力最雄厚的外藩。

侯景为人阴险狡诈，桀骜不逊，在东魏阉朝文武中，他只佩服高欢。高欢死后，侯景就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在东西夹击、走投无路的形势下，他派行台郎中丁和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要求梁武帝派兵增援。

梁武帝接到侯景的降表，马上召集群臣到朝廷商议。尚书仆射谢举劝说道：“近年来我朝与东魏讲和，边境安宁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现在若接纳东魏叛臣，恐怕又要挑起战端，生灵便会再遭涂炭，臣以为不可！”梁武帝听了，显得很不高兴。但多数大臣都赞成谢举的意见，劝梁武帝不要接纳侯景。

正当梁武帝为群臣反对接纳侯景烦恼之时，中书舍人朱异奏道：“侯景献土来降，这是天意！天命不可违，违天不祥。”

梁武帝见有人附和，转怒为喜：“我国家固若金瓯，毫不伤缺，如今侯景献地来归，本是巴望不得的事，理当接纳。如果纷然不决，将来必定后悔！”

朱异又道：“天下有圣明的天子，才会东西降服，南北归仰。现在侯景来降，是北方归附的先兆，如果一开始就加以拒绝，谁还愿意前来归附？希望陛下圣心独断，不要以众议为虑，不要再迟疑了。”于是，梁武帝不顾群臣反对，决心接纳侯景，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令丁和带着飭令回去报告侯景。接着，梁武帝又派司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带领三万人马奔赴悬瓠，运送粮草接应侯景。

梁武帝的接纳，使侯景在同东魏高澄的斗争中得到了一个庇护所，得到了一条退路。而梁朝本身则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因为，黄河以南的十三个州仍然为侯景管辖，但高澄攻打侯景时，梁朝却没有理由不给侯景以粮食、武器、兵力的支援。

548年8月中旬，侯景在寿阳起兵反梁，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卫率陆验为名。朱异等人蒙蔽梁武帝，贪赃枉法，罗置私党，扰乱朝政，为当时人所愤恨，称之为“三蠹”。侯景为邀买人心，所以以诛除他们的名义起兵。

梁武帝听到侯景起兵的消息，很不以为然。他命令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共同讨伐侯景。又命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邵陵王萧纶持节统率众军。梁武帝的这种布置，是想把侯景围困于寿阳地区，一举歼灭。

侯景听说梁兵前来进攻，便问计于王伟。王伟向他献策说：“如果坐待萧纶率军前来进攻，彼众我寡，必为萧纶所困。建康有萧正德为内应，不如抛弃淮南，轻兵直取建康。这样，萧正德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贵神速，宜快不宜慢。”

9月25日，侯景谎称游猎，离开寿阳。他扬言进攻合肥，军队却以最快的速度去攻打谯州（今安徽滁县）。谯州守将董绍先开城投降。接着，侯景又去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太守庄铁也开城投降。王伟的策略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庄铁向侯景献计说：“国家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听说大王举兵，举国震骇。大王应该趁此机会直捣建康。这样，可以兵不血刃而成大功。如果进兵迟缓，使朝

廷得以从容布置，要想取胜就很难了。假若朝廷派数千羸弱士卒防守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大王纵有雄兵百万，也不能渡过长江。”侯景依计，引兵到达长江北岸的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面对江南的采石）。

都官尚书羊侃向梁武帝建议：以两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萧纶袭取寿阳，使侯景进不能前，退又失去巢穴，自然瓦解。但梁武帝没有采纳。他听信了朱异的话，以为侯景并无渡江的意向，只派宁远将军王质率水军三千巡江防守。更可悲的是，他起用了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屯驻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把保卫建康的大权，交给了这个内奸。

萧正德接到这个命令，喜出望外，他派出大船数十艘，谎称运送柴薪，到了采石对岸，准备接运侯景的军队过江。但此时侯景仍怕王质作梗，不敢轻易渡江。可笑的是，朝廷好像有意让侯景如愿似的，竟把王质调离采石，而接替他的云旗将军陈昕又迟迟没有到任。江防重地采石一时竟无人防守。侯景得知这一情况，大喜过望，马上命令部队上了萧正德派来的接应船只，横渡长江，在采石上岸，没有遇到一点阻力。此时，梁武帝还在梦中。

渡江后，侯景已有八千人马，很快打到姑孰（今安徽当涂）。这时，梁武帝才惊醒过来，命令太子萧纲指挥军队抵御侯景。可悲的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萧纲，也不识萧正德是内奸，把防守建康台城南面的朱雀门与宣阳门的重任托付给了他。

10月23日，侯景率军抵达板桥（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板桥镇）。为探听建康城中虚实，他派谋士徐思玉前去求见梁武帝。梁武帝召见时，徐思玉称自己是诈降侯景，有机密事相告。梁武帝信以为真。徐思玉拿出侯景的书信呈给梁武帝，信中称朱异等人弄权，欺罔君上，残害臣下，请求带甲士入朝，除君侧之恶。侯景信中又请求梁武帝派人前往自己军中谈判。梁武帝此时对侯景仍存有幻想，派遣中书舍人贺季与主书郭宝亮随同徐思玉前往板桥。侯景将二人迎入帐中。贺季问他：“皇上待大王不薄，大王无端起兵，究竟是为了什么？”侯景不加掩饰，随口答道：“想当皇帝！”王伟在旁连忙说道：“奸臣朱异等人欺瞒君上，祸乱朝纲，举国上下，无不恨之入骨。侯王起兵，便是想诛除奸臣，以清君侧！”

侯景将贺季扣押，只把郭宝亮放回建康。次日，叛军抵达秦淮河南岸。秦淮河



梁武帝修陵前仅存的天禄

上有朱雀桥与建康正门朱雀门遥遥相望。朱雀桥是一座可以起落的活动桥，萧正德的军队正屯兵于此。当晚，萧正德的党羽沈子睦落下桥板，引导侯景的军队过了朱雀桥，进入朱雀门。萧正德带领侯景的军队进入宣武门。一路通行无阻，很快将台城包围起来，阻绝了台城和石头城（西城）、东府城（东城）的联系。

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对于梁武帝来说，一是因为骄，以为侯景成不了气候；二是因为暗，以为萧正德是根可以托付重任的栋梁。然而，这还只是悲剧的开始。

据说，最后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去皇宫里抓萧衍时，曾发生了这样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萧衍见侯景来，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这时害怕得汗流满面，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安慰他说：“你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

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其实，侯景一是作乱心虚，二是萧衍本来也是战场勇将，侯景肯定早就有敬畏之心，加上当时迷信思想严重，认为天子都是神灵下凡。还有萧衍信佛后，看清权势，也看轻权势，他的镇静无疑更让侯景心虚。

但是，侯景毕竟是作乱打进都城的，他的军队掌握了都城的管理大权，他的卫兵进出皇宫很随便，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也很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限制他的供应。结果萧衍很快病了，后来不能起床，最后连饿带病加生气，闭眼西去。终年85岁。他的谥号是武帝，庙号是高祖。

抗战词曲家沈肇华在鲁南

王晓华

沈肇华，又名沈琪生，宿迁市（原淮阴）泗阳县众兴镇人，1912年出生，是中共淮盐地下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词曲家。代表作品有《洪泽湖渔夫曲》《攻徐州》《月儿渐渐高》《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团歌》《小儿郎》等。1940年，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期间，被疑为“托派”分子，遭错杀。

1938年初，淮涟泗一带的民众抗日运动遭到韩德勤反动政府的残酷压制和破坏后，沈肇华等人前往山东临（沂）郯（城）一带找到党组织，重新参加革命工作。

1938年4月21日，临沂失陷，日军继续南犯，不久，郯城县城陷落。至此，临郯一带主要城镇被日寇全部占领，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鉴于“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存在关门主义倾向，不适应大发展的抗日斗争形势，5月上旬，在临沂南乡三重村小学成立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总团”（简称青救团），临沂早期党员、原“民先”组织部长丁梦荪任常务委员（主要负责人），旨在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当时临郯地区群众性最广泛的抗日组织。

根据组织安排，沈肇华被调至“青救团”工作。沈肇华才华横溢，能文善歌，多才多艺，音乐禀赋极高，谱曲作词，样样精通。在“青救团”工作时间不长，沈肇华就充分发挥其音乐专长，精心为“青救团”谱写了一首《临郯青年救国团团歌》，歌词由丁梦荪创作。这首团歌，像战斗的号角，吹响在临郯大地上，震荡着每一位抗日青年的心弦。在这首歌的鼓舞激励下，大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加入到青救团组织中来，临郯青年救国团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同月，临郯各地区相应成立县团各分团，临郯青年救国团马头第七分团（后改为临郯青年救国团第22分团）就是其中影响较大一个分团，负责人为徐昆吾。郯城人方平、邓果、蓝会武等一批青少年加入该分团。

为支持和帮助马头镇分团开展工作，不久，沈肇华从“青救团”调到马头镇特别分团工作。与沈肇华同来的还有皖东北的徐静和王伯两位女同志。另外，还有沈肇华的爱人高其功和孩子。

在马头镇分团，沈肇华根据苏北民歌改编创作了歌曲《月儿渐渐高》。

歌词通俗易懂、基调哀婉流畅，经分团成员们的传唱，成为当地群众十分喜爱的抗战歌曲，在鲁南一带流传甚广，对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1938年5月下旬，徐州沦陷。沈肇华闻之，悲恸万分，彻夜难眠，遂创作歌曲《攻徐州》：“日本鬼子强占徐州，杀人放火扰乱不休。这口闷气不能忍受，大家一心要夺回头，直向前，莫退后，我们要报仇。”“手榴弹，哇！大刀片，杀！看准那目标，不让他逃走，冲进去，冲进去，冲冲冲徐州！”

抗战爆发后，郯城县马头镇的抗日组织纷纷建立。马头镇少年儿童在地方党组织的宣传、影响和引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运动中。1937年下半年，由方平、蓝会武、文渊、任国良、林文汉等少年儿童组成“郯城县儿童抗敌后援会”。这是抗战爆发初期山东成立的最早的儿童团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散发传单、街头募捐、油印小报和教唱抗日歌曲。

沈肇华了解到方平他们组织过“儿童抗敌后援会”的情况后，便鼓励和帮助他们成立少年工作团，服务少年儿童。在少年工作团中，又组建起儿童歌咏队，创办《大集报》墙报，宣传抗日政策。墙报模仿报纸样式，有整张新闻纸大小，稿件由沈肇华提供，方平负责绘制插图，文渊、蓝会武负责用毛笔抄写，邓果装饰花边。每逢马头镇逢集就出版一期。《大集报》张贴在最繁华的“集口处”南戏楼上，很受群众欢迎，影响很大。

不久，郯城县妇救会也创办了一份报纸，沈肇华为其题名《三八报》。关于这个报名，沈肇华解释说，“三八”是妇女节，用以代表是由妇女们创办的报纸；其二，马头镇旧历三、八逢大集，人群集聚，便于隐藏，宣传效果也会更好。

为扩大抗战影响，教育和鼓舞民众抗日，沈肇华在少年工作团和妇救会中选拔出30名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组成文艺宣传队，并亲自指导培训，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队以马头镇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演出。每次演出，沈肇华只要有时间，都亲自带队，有时远赴百余里，深入前线慰问官兵。

方平是马头镇较早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少年，极有艺术天赋，很受沈肇华器重。沈肇华经常向他传授谱曲作词、戏剧表演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艺。有一次，方平独出心裁，用纸剪裁了一些小人物，每位成员发一个，像八路军臂章一样粘贴在胳膊上。沈肇华看后大为赞赏，连声叫好。他也选了5个，并对方平说，这就像《救亡进行曲》歌词中所说的那样：“工农兵学商……脚步合着脚步，臂膀靠着臂膀。”在沈肇华的指引和教导下，方平以后走上了更为广阔的艺术之路，创作并导演了一批有影响的文艺作品。

随着歌咏队影响力的扩大，周边镇外的儿童也纷纷加入到歌咏队。在沈肇华的建议下，成立了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4个大队，每一个大队下设3至4个中队。沈肇华还为此专门创作了儿童歌咏队队歌《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心眼要比大人强。学会当侦探，学会把歌唱。拿小刀，拿小枪，走上战场，走上战场。捉几个日本鬼，叫他回东洋。捉几个狗汉奸，送他见阎王。发一个无线电报，小儿郎的名字天下扬，小儿郎的爹娘也都跟着沾了光！”

这首歌一经诞生，便迅速在郯城一带传唱开来，并延展至周边各根据地，甚至传播至敌战区，在鲁南、苏北一带产生深远影响。

1938年12月，临郯青救团武装在临（沂）枣（庄）公路边小城东伏击日寇，取得缴获1挺机枪、3支三八式步枪、子弹千余发、太阳旗一面的胜利。这是临郯抗日武装成立后打的第一大胜仗。第二天是马头镇集日，在伏击战中表现英勇的战斗英雄王槐三和他的战友们带着战利品，来到马头分团，准备在集市上对群众进行展览宣传。为歌颂英雄事迹，宣传抗战成果，沈肇华当即编写了一个庆祝胜利的歌曲

《庆祝胜利歌》，由少年工作团和妇救会骨干在集市上高唱：“王槐三和冯士友，真是群众的射击手。打死日本鬼，机关枪步枪夺到手。同志们齐奋斗，学习他二人。他们不是三头六臂九只手，嘿！他们能向前，咱也不落后。下一回，要替牺牲同志去报仇。捎来几个鬼子头，鬼子头！”此歌一经传唱，即轰动一时，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和队伍的士气，提高了临郊青救团的威望，壮大了武装力量。

同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在邳县成立。沈肇华调到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被分配在政治部任宣传科干事。1939年9月，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对发展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苏皖纵队领导机构成立，开往苏皖地区，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沈肇华又被调到苏皖纵队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

1939年秋冬，受康生《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一文的影响，湖西抗日根据地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近300名优秀党员干部被冤杀，500多名被关押、刑讯。后虽经罗荣桓竭力挽救，湖西危局得以缓解，但山东一些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春，仍然不时发生类似“肃托”事件，很多无辜者被冤屈杀害。

据《中共鲁南区党史大事记》载：鲁南地区从1938年始，就进行所谓的“肃托”。对部分抗日知识青年、革命干部用“逼供”的方法进行“审查”，错误地把一些人定为“托匪”处死，造成了冤假错案。据初步统计，先后被错杀的有贾丰、于公、肖明、沈淇生、许峰等30余人。沈淇生即沈肇华。

1940年时任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总后勤部原军事交通运输部顾问栗培元同志，也有过关于沈肇华被错杀的回忆：“肃托”风暴也波及到在苏皖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陇海南进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有个叫沈东的宣传干事，非常有才华，他自己作词谱曲，创作了一首《保卫苏鲁大平原》的歌曲：这儿是块大平原，苏鲁两省在这儿紧紧相连，一条陇海铁路从这里贯穿，铁路上跑着火车，火车里装来鬼子汉奸和杀人的枪械子弹。他要在这里建立伪政权，他要把这里永久侵占。他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

进攻我们的山区，扫荡我们的平原。山区是我们根据地盘，平原是山区的外线。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这一块大平原，坚持苏鲁平原游击战，赶走敌人，巩固我们的抗日政权，来渡过，渡过困难的新阶段。来争取，争取胜利的明天！

那时候，山东八路军中能作词作曲的人少之又少，这首歌很快就在全支队里传唱开了，指战员们都很喜欢。就是这样一个有文化，有才华的青年宣传干事，在“肃托”中被指为托派分子，遭到杀害。

根据忆文所述，从姓氏、职务、才艺及所在单位等许多细节分析看，栗培元所说的“沈东”，应该就是沈肇华同志。

1984年3月5日，中共陆军六十三师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精神，作出给沈肇华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中说，沈肇华同志青年时代就思想进步，积极投身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囚禁，始终保持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抗日战争初期，他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发动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他创作的歌曲，至今仍为许多八路军老战士珍藏。沈肇华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1940年被怀疑为“托派”并被错杀，是当时肃反工作中“左”倾错误影响和战争特定环境造成的，确属冤案。经师党委研究决定给沈肇华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攻 徐 州

1=D $\frac{2}{4}$

沈琪生 作

进行速度 慷慨激昂地

$\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3}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2} \quad |$
日 本 鬼 子， 强 占 徐 州， 杀 人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1}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3} \quad | \quad \underline{3} \quad 0 \quad |$
放 火， 扰 乱 不 休。 这 口 闷 气，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2}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2} \quad |$
不 能 忍 受， 大 家 一 心 要 夺 回

$\underline{1}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6}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
头。 直 向 前， 莫 退 后， 我 们 要 报

$\underline{5} \quad 0 \quad | \quad \overset{>}{\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overset{>}{\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overset{>}{\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0 \quad | \quad \overset{>}{x} \cdot \overset{>}{\sim} \quad 0 \quad | \quad \overset{>}{\underline{\dot{1}}} \quad \overset{>}{\underline{\dot{1}}} \quad \overset{>}{\underline{\dot{1}}} \quad 0 \quad |$
仇， 手 榴 弹 咋！ 大 刀 片

$\overset{>}{x} \cdot \overset{>}{\sim}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
嚓！ 冲 上 去！ 冲 上 去！ 冲 上 去！

$\overset{>}{\dot{1}} \quad 0 \quad | \quad \overset{>}{\dot{1}} \quad 0 \quad | \quad \overset{>}{\dot{1}} \quad \overset{>}{\dot{1}} \quad | \quad \overset{>}{\dot{1}} \quad - \quad | \quad \overset{>}{\dot{1}} \quad - \quad ||$
冲！ 冲！ 攻 徐 州！

注：作于1938年秋。为51军抗日义勇宣传队而作。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八)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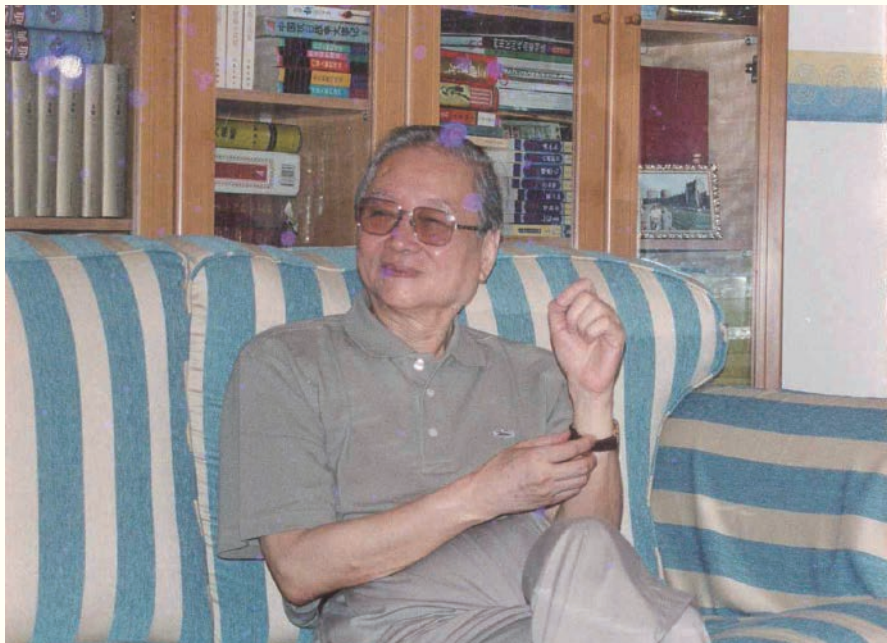
文朋画友情长谊深

皮之先为人厚道，待人和气，在文艺界朋友很多。

王火在《皮之先与他的山水画》一文中说：“从50年代初到今天（1990年），我同之先已有近40年的友谊。我了解他这个人，也一直在关注着他的画。”由此可见，王火与皮之先的友情源远流长。

王火（1924—），江苏如东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和散文，出书30余本，仅长篇小说就有12部。代表作为160万字的史诗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953年春，王火从上海被调到北京，在《中国工人》杂志社任编辑、记者。随后（1954年），皮之先也调到该刊任美编和记者。两人成了同事



作家王火

和朋友，一文一图，两人配合和谐默契。王火根据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编写出上海工人运动史，皮之先就以此为脚本画成了连环画《上海工人运动史画》。1955年6月，因世界和平理事会要在芬兰召开，《中国工人》杂志约请了齐白石、陈半丁、何香凝、于非闇等14位画家，集体创作巨幅画作《和平颂》。之先联络画家们完成了画作，王火又去请郭沫若在百忙中题写了“和平颂”三个大字，并将作品带到大会上献礼。有一年的“五一”节，之先约请陈半丁、王雪涛等著名画家作一幅巨画作为刊物插页，王火又去郭老家，约他为画题名“五一颂”，并配了一首诗，诗中有“五一声威壮，劳工创大同”的句子。工人读者看了很赞赏。

当时，每逢星期天，之先都要去故宫。起先王火以为他是去游玩的，后来才知道之先对民族绘画痴迷，是去观摩研究历代名画的。王火亲眼看到之先站到一幅古色古香的山水画前凝神默睇，久久不动。王火深为之先那种“面壁十年”艰苦钻研的精神所感动。

为了约稿，之先结识了齐白石，并向他学画红花墨叶牡丹，之先画得很相似，有时可以乱真。王火看了很喜欢，之先便画一幅赠给他。王火爱看之先作画，并边看边评论。之先为人谦虚儒雅，听到批评意见，即使尖锐也不生气。当时之先画画的面比较广，西画、国画都画，国画中山水、人物、花卉都涉及。王火劝他按李可染的教导“挖井七八个，一个也没有挖出水，不如集中力量挖一口井见水”，要有所侧重。此后，之先专攻山水画。

1961年，《中国工人》奉命撤销。之先和王火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二人带家属乘坐一辆车来到临沂。两人同在一城，两家过从甚密。直到1983年，王火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两人才分手。不过仍鱼雁往来，每逢过节，互寄贺卡，互致问候。两人有新的作品、画集，也互相寄赠。

有一年，之先到四川峨眉山写生，下山后专程到成都拜望王火。王火把他安排在成都最豪华的锦江宾馆，并到宾馆看他作画。以后，之先出画集，王火专门写一篇评论（见前文）放在画集中。对之先的山水评价很高：“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一样，没有矫饰，没有矜炫，但画中都跳动着生命力，紧密地联系着观赏者，使人感到可游可居，挂在壁间可陶冶性情，意味无穷。观其画，咫尺千里，气象万千，大好河山，可观可爱。”

2011年夏，与王火相濡以沫60年的爱妻凌起凤不幸去世。王火将此噩耗告诉之先，在电话里王火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八十多岁老翁哭得像个孩子。由此可见他两人感情多么亲密！

之先和画友车天德的友情之深厚，合作之默契，在画坛也传为佳话。

车天德（1936—2014），山东青岛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是画家于希宁、张鹤云的高足。毕业后分配到莒南师范教美术。后调入临沂地区艺术馆任美术创作员。1981年调到《山东教育》社任美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新闻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61年8月，之先结识了车天德。当时，之先刚来临沂，在《临沂大众》报当美编，车天德经常画些素描小画投给报纸。之先发现他的画（如《支援秋收》《锯锅》《山村新学年》）很有农村生活气息，技法也较熟练，所以来稿必登。上世纪70年代，两人先后调到地区艺术馆，所谓“一个锅里摸勺子”，就朝夕相见，经常合作了。当时美术创作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是领导给的政治任务，让画家去画，创作时又倡导集体合作（署名是“某某创作组”）。比如：为了宣传新愚公精神，他们合作了连环画《厉家寨》和国画组画《社会主义时代新愚公》等。由于审美观点相同，脾气相投，他们一起合作达十五六年之久。车天德年青力壮（小之先



皮之先与车天德（左）

八岁），在前面搞速写，而之先在后面进行创作，由于配合默契，风格一致，佳作不断。在画坛常有“车皮车皮，皮离不开车，车离不开皮”之说。可见俩人之间的融洽程度。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一书中这样评论道：“皮之先和车天德是20世纪70年代著名黄金搭档，他们生活、创作在沂蒙革命老区，有画坛‘车皮’的雅号。他们合作了一大批表现蒙山沂水的画作，通过出版、发表影响了一代人。作品注重传统技法与现代气息相融，透出清新、隽秀、滋润之气，使之回味无穷，对当时山东山水画向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原临沂教育学院（后并入临沂大学）的体育老师王书城副教授，是之先老师的挚友，也是受他熏沐、指教，在工艺、雕塑等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业余美术师。王书城，1939年生，山东济宁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体操专业。因为体操造型、舞蹈都是与美术相通的。因此，他在从事体操教学同时，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工艺制作，图案设计，泥塑方面钻研和修炼。

王书城与之先同在一个教研组——艺体教研组，这给王书城学习美术提供了方便条件。每逢书城画一张素描人像，雕一尊泥像，都要请皮老师指导，皮老师总是诚恳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使书城受益匪浅。之先很喜欢书城的泥塑，不仅形神逼真，而且有民间泥塑的稚拙之趣。他让书城特意为自己雕了一尊佩围巾的塑像。

由于得名师点拨和自己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王书城在工艺、设计和雕塑诸多方面均取得卓著成就。他共创作800多件雕塑作品，有峨冠博带的三闾大夫屈原，有羽扇纶巾的诸葛亮，有长髯凤眼的关云长，有握管沉吟的王羲之……还应约为亲朋好友雕像100多件。

书城经常被借调到展览馆搞版面设计。他为全省勤工俭学展搞的版面设计，获得设计一等奖；在临沂地区搞的综合展中，他搞的教育、体育展板得到业内专家和领导的好评。

王书城多才多艺，是个多面手。他懂建筑、会木工、精装饰，他自己动手为自己建了一个“书城艺术馆”，馆藏160件，件件精工细作，幽雅脱俗。临沂电视台为书城的艺术所吸引，为他拍了《王书城的美工艺术》专题片。

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 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死亡之谜

大国雄兵

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陕西富县西北的直罗镇围歼进犯根据地的敌军，全歼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一〇九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追歼一〇六师一个团。是役，共打死打伤敌军官兵1000余名，俘虏5300多名。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此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



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的下落一直是军史界争论的话题。牛元峰，山东沂水县北朱冬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后到东北讲武堂任教，曾任东北军辎重兵司令等职。1935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零九师师长，奉命率部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

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萧华将军于20世纪60年代作词的《长征组歌》曾风靡一时。其中的《祝捷》中这样写道：“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牛元峰被我军活捉一直是家喻户晓的结局。但牛元峰到底结果如何，还有许多版本。

曾经参加指挥直罗镇战役的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在《奠基礼》一文中回忆道：“（1935年11月24日）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一气追了25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在这里，徐海东没有说明牛元峰的最后结局。但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在直罗镇指挥所里，几位领导人谈论起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因毛泽东有“放心，我们今天也来个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之语作保证。徐海东曾说：“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敢说了！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此为牛元峰被俘后红军将其杀死一说，与之后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孟良崮之死类似。

《彭德怀年谱》记载说：“（1935年）11月24日，（彭德怀）发给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电：直罗镇被围之敌两营突围向东北逃窜，当即尾追，望搜捕敌师长牛元峰及其他团、营长。当日，十五军团全歼直罗镇突围之敌，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曾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沈叔明（时任东北军一〇九师参谋处长）在《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手枪）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曾亲历过直罗镇战役，时任红十五军团保卫局特务员的詹大南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叙述道：“我率少共营乘机冲上去，两面夹攻，猛打一阵。在战斗进行中，我边追边问抓到的俘虏，查问牛元峰的下落。在半途中，一个敌伤兵对我们说：‘牛师长、参谋长与卫队一起，都在前面。’大约9时，战斗结束。我牢记着徐军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急问红二二五团的同志‘有没有敌人向南跑掉’，他们回答说：‘都圈在这里，一个也没有逃脱’。我心想：现在既然一个也没跑脱，就一定能找到牛元峰。果然，在最后围歼敌人的地方，我们很快查找到了被俘的敌师参谋长。于是我大声问：‘你们师长呢？’他用手指着离我们十多步远的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我开始还不相信他的话，又问了旁边几个俘虏。这时，敌参谋长指着地上的一个红色长方形的大本子对我说：‘请你对照军官录上的照片。’我拿起一看，里面少校以上军官都附有照片，第3页是少将师长牛元峰，占了半页。我走过去看尸体，只见他头朝北趴在面向我追击部队的反斜坡面上，旁边还有几具敌人尸体。看到牛元峰这种死后卧的姿势和处在山脊棱线后的具体位置，

可以断定：他是在抵抗过程中被我军击毙的，而且被我追击部队击毙的可能性较大。我跨上一步使劲地把尸体翻过身来一看，面部和上身都是血。我辨认不清楚，不敢肯定此人就是牛元峰。由于事关重大，又接连问了其他几个俘虏，他们都说此人就是牛师长。接着，我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在手掌上印了一下，是篆体字，我不认识。于是，我让少共营留在原地待命，看守敌参谋长和这具尸体。我领着两个战士，带着军官名录和私章向军团长汇报。经过认定，私章是牛元峰的。徐军团长很高兴并命令通信员通知少共营把牛元峰的尸体抬下山来。后来，听说牛元峰的尸体埋在文家庙北头的小土包下面，次年东北军来人挖出来，火化后包了一包骨灰带走了。”

综合上述，牛元峰应未被俘，而是在战场上当场死亡。徐海东和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未亲自在战场实地勘验，其说只能聊备旁证。亲身经历现场战斗的留下回忆录的国共双方将领因立场不同，各执一辞。共产党方面以牛元峰的死亡位置及死后趴的姿势认为其是被红军击毙的，翻其身体时面部和上身有血，但未提枪伤在身体何处，面部伤势如何。国民党方面认为是枪弹从后击穿脑部，炸碎面颊而死。这一枪是红军打的还是其副官遵令打的，如果詹大南将军提到牛元峰面部的伤势情况即可破解，如面颊未碎，说明枪弹为远距离射出，应为红军打的；如面颊已碎，应是近距离射击的结果，应是其副官打的。但现在已无从知晓，姑且两说并存，作为历史之迷留待后人去解吧。

另外，直罗镇战役后，红军缴获了牛元峰的德造左轮三号手枪，后一直为左权使用，一直佩戴到牺牲。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将这支手枪赠给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留做纪念，后被王政柱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而沈叔明提到牛元峰佩戴的是勃朗宁（手枪），非左轮手枪，这也是双方所了解的不同之处。

季氏与费县 (上)

丁兆铭

一、季氏溯源

据《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史书载，费县季氏之先祖为周姬氏，而周姬氏之先祖为后稷氏。故季氏祖先可上溯至后稷。后稷名弃，其母曰姜嫄，为帝誉元妃，元妃踏巨人脚印怀孕而生弃，弃长而善种树麻、菽、稷，号曰后稷。传至季历（公季），公季生子名姬昌，是为周文王。在位50年，传子武王姬发。武王灭商，建国号周，西周始。是年为公元前1046年。武王有弟曰姬旦，号为周公，辅佐武王东征西伐，功高，武王十一年，封周公于鲁（今曲阜），为鲁公。周公未就封地，留佐武王。周公之子伯禽赴封，为鲁国始君。得周成王特优待遇，得一切礼仪如周制，用天子礼乐，可郊祭文王。伯禽传至鲁桓公（公元前711年），有三子同辅鲁政，称为“三桓”，庆父为孟孙氏，叔牙为叔孙氏，季友为季孙氏。鲁国季孙氏始以季为姓。桓公传庄公（公元前662年），庄公卒，庆父杀太子般，公元前660年又杀闵公。国内政治动荡混乱。季友借助齐桓公之力，逼庆父自缢死，拨乱反正，立僖公，使鲁国再续正统。季友因此功大，得僖公封私邑于费，并赐汶阳之田。”（《左传》）此为僖公元年（公



郑国故城遗址

元前659年)事。费县季氏自此始。季氏于“三桓”中最为强势，从季友至季康子(肥)，八代人六任正卿，共辅佐桓公至哀公十二位鲁君200多年，季氏皆为正卿，执鲁国权柄，且政绩辉煌。季氏执政时期，也是鲁国最兴盛的时期。至鲁哀公时，春秋结束，战国开始，鲁国衰微至小诸侯国地位，季氏也在鲁国政坛上消失。此后180年间，一直到鲁倾公被楚所灭，季氏也未再见诸史书。研究春秋鲁国季氏，到目前为止也只好限于春秋与战国之交的公元前468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是年为战国8年，鲁《春秋》记事也止于此年。惟《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鲁悼公卒，十四年(鲁元公二

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邱。”可见康子卒后40年里，季氏仍在鲁国执掌权柄。战国时期，费邑自为小国，后世有史家认为费国为季氏之国，至于费君为谁，光绪《费县志》认为“盖季氏之后”，但无史料可证。《史记》中司马迁曾为季布季心兄弟立传，称季布兄弟为楚国人。但可否推想，当年楚灭鲁费时，季氏是否有人被掳掠或其他原因而至楚国，于是在楚国发展。季布也未尝不可能为鲁国季氏之后。惜限于史料，惟不敢妄断。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即鲁国季氏始终有一部分后人在他们的发祥地费县繁衍生息，薪火相传，他们就是今天费县之季氏。

二、季氏行略考

季友(成季)

季友，号成季，鲁桓公少子，生年无考，卒于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葬地不明。季友应运而生于春秋早期(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这是大有作为的历史阶段。这段历史成就了季友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季友辅佐了桓、庄、闵、僖四代鲁君。

季友奇人奇相。《左传》载：“季友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曰：问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季友先天带来“友”字手纹。于是以“友”为名。又卜又筮，皆预测到他后来必贵，且与鲁国命运盛衰相关联。这虽然是迷信和穿凿，但季友后来确实成为了一位划时代的政治家。

季友有杰出的政治才能。鲁桓公时，虽然是“三桓”辅政，但活跃在鲁国政治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庆父和季友。季友尤其杰出。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庄公卒。季友遵庄公遗命所立嗣子般被庆父所杀，庆父立闵公。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庆父又杀闵公欲自立，导致鲁国内乱。季友借助齐桓公之力，逼迫庆父于自齐返鲁途中自缢死。立庄公少子申为僖公，再续鲁国正统。因此，僖公于元年(公

公元前659年)即“赐季友私邑于鄆,并赐汶阳之田”。

季友具有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从史料看,季友推行的是和睦邻国,突出大国外交的策略。据《左传》载,早在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69年),季友就曾出使西南方邻国陈国,并与陈结盟。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季友以私人身份再使陈国,参加陈国正卿元仲的葬礼,此行虽因属私行而被责为失礼,但这无疑也对国家外交有着正面的影响。和齐国结盟,则反映出季友审时度势,实行大国外交策略的正确。因为当时齐桓公称霸(公元前679年始),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是名正言顺。加之齐国作为天下诸侯之霸主,势力强盛,诸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鲁国利益考量,与齐结盟,至少能赢得鲁国的安全与安定。为此季友多次出使齐国定盟,以稳定和巩固齐国的盟友关系。《左传·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冬,公子友如齐莅盟”“会于阳谷,谋伐楚也。”《左传·僖公七年》(公元前653年),“公子友如齐”“会见管仲,盟于宁母。”《春秋·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冬,公子友如齐”,与齐约盟,参与讨论盟国如何拥戴周天子的权威问题。与齐交好,不仅使鲁国得到安定并发展,而且季友个人关键时也得到了齐桓公的帮助,例如平息庆父之乱,就得到了齐桓公的帮助。季友的军事才能,首先表现在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内部稳定之初,“季友帅师败莒师于郟”。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内对外树立了国威,对稳定刚结束内乱的鲁国,其意义不言而喻。其次季友多次参加了以齐桓公为盟主的盟军的军事行动。此不赘述。

总之,季友使鲁国走上了稳步发展之道路;季氏二百年“政治世家”的地位也从此确立;费县自此也成为了季氏发祥之地。

季孙行父(文子)

季孙行父,谥“文”,季友之孙,生年不详。卒于鲁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继季友为鲁国正卿。辅佐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四代鲁君。甚至也许在季友去世后就已辅佐过僖公。因为僖公享国33年。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季友去世,襄公后十七年虽无记载季文子执政之事,但不排除季文子已参政的可能。这样,季文子在鲁国执政超过50年之久。

季文子是一位久经历练,成熟老到的政治家。内政方面,他首先重视提振民心、军心,为国所用。季文子时代,鲁国发展呈上升趋势,但矛盾也在萌生、积累和加深。季文子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他向成公陈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弔者也夫!”对军心民气忧心忡忡。

季文子执政期间,勤政忠君,政绩突出。首先他大搞鲁国的国防设施营建。《春秋》载:僖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作南门”。重新修建了鲁国城南门。

文公七年(公元前626年),“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郛”(《春秋》)。郛为边防要塞。

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21年),



鲁国大夫季文子(晋顾恺之画像)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郛”。亲自率军队建郛城，郛城在莒鲁交界处，建此城有军事防御的目的和功能，属于重大的军事设施建设。

军事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相对和平稳定，诸侯之间战事较少，只在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因为出使齐国受人格之辱（文子为驼背），及“齐侯伐我北鄙”，为报复，“六月，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几国军队联合，打败齐国。还有一次是成公八年，不情愿地派宣伯帅师随晋国的士燮讨伐东南小国郑国，取得了胜利。

在外交方面，季文子帮助鲁君确立了盟晋和齐的方针。季文子时代，齐国霸主地位已由新崛起的晋国取代（管仲晚季友八年卒，齐桓公晚季友九年卒），鲁国作为中等诸侯国，与晋结盟是明智的，和齐的关系则是亦和亦斗（从《左传》所记载两国的关系看，是极不稳定和不正常的）。和国力相当的陈、宋、郑等国则是力求和睦相处，对远方新兴大国例如楚则敬而远之。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在盟晋还是盟楚的问题上，季文子阻止了成公叛晋联楚的策略。“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左传·成公四年》）无疑，这是非常有外交眼光的意见。

外交活动上季文子是躬身践行，不辞劳苦，奔走于诸侯之间。仅《左传》记载，在他一生中正式出使陈、晋、齐、宋、郑等国就有14次之多。其中出使晋国7次，齐国4次。

季文子更突出的是他审时度势、游刃有余的外交才能。《论语》中孔子评价他凡事“三思而后行”，实不过分。每次外交行动，他都深思熟虑，例如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礼仪，如何应对突发意外情况的几套预案，都准备得严谨充分。《左传·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外交家有备无患的思维，是何等缜密。在外交场合，季文子总是以维护“礼”为原则。而凭借个人的文采辩才赢得外交成功的很多事，也不能不提及。《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载，季文子与鲁文公会郑伯于赭地，宴会上“子家赋《鸿雁》（《诗经》中哀恤劳役之诗）。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鲁君能体恤百姓之苦）。’季文子赋《四月》（《诗经》中劳役思归之诗）。子家赋《载驰》之四章（《诗经》中求助之诗）。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诗经》中反对安逸之诗）。郑伯拜，公答拜。”双方犹如对歌，辞令委婉含蓄而富文采，从而折服了郑伯。季孙行父卒后美谥为“文”，应该与他的博学儒雅的风度有关。在外交活动中季文子以“礼”为原则，与对方谈判往往获得成功。《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8年）：“季孙行父如齐。”在会见中，大讲周礼中的“德孝敬忠信”等，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因此季文子的外交保证了鲁国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发展和国土完整。例如和齐国的多次外交谈判，终于打消了齐国多次覬覦鲁之济西之土、汶阳之田的欲望，保证了鲁国土地未被掠走。

季文子的清廉，尤其为人称道，在他生前身后赢得了鲁国上下和各诸侯国的普遍赞誉。甚至连周王（定公）也闻知其廉。《国语·周语中》载：周定公八年（公元前599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周天子派人考察诸侯国大夫，到鲁国得知季文子之廉，并向周定公作了汇报。此事足可侧面佐证季文子之廉洁。

《左传·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季孙行父卒。“大夫入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



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襄公亲自临吊，发现季文子家中一无积蓄，贫若民间。作为鲁国正卿的季文子，如此清廉，操行是何等高尚。他的清廉在各诸侯国中传为佳话，当作典范，至今令人深思。

季宿（武子）

季宿，谥“武”。生年不详，卒于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继其父季文子为鲁国正卿，执鲁国权柄32年，辅佐了襄公二十六年，昭公六年。他执政期间基本上沿袭了季文子的内政外交方略，文治武功辉煌。

内政方面，季武子比较注重民生、关心民瘼，勤政爱民。《左传·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52年）载：“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子盍诘盗？”面对国内矛盾的上升，人民的不满甚至造反，季孙宿督促时任司寇的臧武仲治盗，这当然是他正卿的职责，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政治担当和勤政。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载：“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春秋时的季武子竟能发问如何防御冰雹这种自然灾害的问题，确实反映出他关切民生、关心民瘼的良苦用心。其次，季武子大兴土木，建筑私邑鄆城和鲁国边城成郛。季武子在他刚任正卿的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请城费。……故季氏城费。”这是第一次见诸史料中记载费县建城的事。当然，季氏建筑私邑，完全是因为家臣求媚，本质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盘，不足首肯。但建筑边城成郛却是鲁国国家行为，完全是为了强化边防的需要。《春秋·襄公十五年》：“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郛。就是因为鲁国既与齐交好，又与晋结盟，齐国就出兵讨伐鲁国，包围了鲁国边城成郛。于是为了防齐，建城成郛，加强边防。季孙氏、叔孙氏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季武子沿袭季文子以大国强国为外交主轴的方略。盟晋睦邻，与齐则努力维持和平。季武子是鲁国外交舞台上的主角。鲁国的外交策略，主要由季武子去践行实施。《春秋》载：他一生正式出使晋国八次，卫、宋各两次，齐一次。至于在国内迎来送往，活动更多。表现出他超人的外交才能。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文化外交。一是他在任何出使或接待的场合，都坚持维护“周礼”的立场，展示鲁国礼仪之邦、文明之国的形象。因为诸侯国中只有鲁国可享用周天子的礼乐之仪，在当时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的情况下，鲁国维护正统的做法在外交上既是名正言顺，又借此展示出了鲁国的特殊地位，受到了诸侯的尊重。例如：《左传》载：昭公二年（公元前541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季武子赋《邶》《节》……宴于季氏，赋《甘棠》。”晋韩宣子来聘，武子赋《角弓》《彤弓》；季武子出使晋国，在宴会上赋《六月》；季武子使宋回，赋《南山有台》；襄公二十一年回访宋国，武子赋表达兄弟之情的《棠棣之诗》。从这些外交活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一是鲁国不但极力维护周礼，而且是周礼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建设者和宣传执行者。文化的软实力大大帮助了鲁国外交的成功。二是也见出当时各诸侯国对鲁国周礼文化的羡慕和赞赏，三是可见出季武子是鲁国文化的践行者，外交场合中随时现身展示，儒雅倜傥的正卿形象表现得魅力四射。鲁国外交的成功，与季武子个人的文化修养、个人魅力、品位也是密不可分的。

具有文才武略的季宿也不愧于“武”的谥号。他执政期间，武功显赫。他东征西伐，战则必胜。《左传》记录了他的几次军事行动。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冬十月，诸侯伐郑……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郈从荀莹、士匄……围郑。”逼郑订盟，这当然是凭借武力、炫耀国威的霸道行为，定的是霸王条约。襄公十二年

（公元前561年），“春，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郚，取其钟以为公盘。”莒国侵犯，强力反击，一举进入敌国边城郚，顺手掠夺象征国家权力的重器钟而归。这场战争既看出季武子军事统帅的杰出才能和勇猛之气，同时也反映出季武子掠夺本质的另一面。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武子取卞。”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季武子伐莒取郚。”记录文字简要，但看出季宿凭借军事实力扩疆拓土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气魄和野心。“春秋无义战”，弱肉强食，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季武子深得其义。但季武子于鲁国却应是赫赫功臣，战功彪炳青史。

季氏到季武子，在鲁国的地位权势几乎达到顶峰。季氏的专权使鲁国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但季氏并无顾忌，季宿为了强化自家的地位，于襄公七年建筑了私邑鄆城后，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又进行军制改革。原来鲁国只有上下两军，权属鲁君。季武子在两军的基础上增设中军。由三桓各执一军。与鲁君分享全国的公民、军赋：当时全国人、赋共分十二份，三桓占七，鲁君得五，此时可见鲁君地位已够可怜。可是在二十五年后的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武子又进行了“舍中军”的改制。“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季氏名义上是罢裁中军，只保留二军，实际上是把二军变为四军，季氏自执二军，孟、叔各执一军。这样三桓地位强了，季氏更强了，国民、军赋被三桓全部占有，然后三桓从自己所征税赋中拿出些许贡于鲁君。这样鲁君就被完全架空，仅靠仰人鼻息，政治、经济、人事权限陷于完全被剥夺的局面。公室何其不衰！孔颖达对季氏的军制改革，疏解十分到位：“初作三军，十二分其国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国民不尽属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军，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税以贡于公，国民不复属于公，公室益卑矣……作中军，卑公室之渐，舍中军，卑公室之极……”“四分公室，制法别耳”“季氏实欲自厚”（《十三经注疏》）。季氏一步步削弱公室以达自强、自专。孔疏对其设中军舍中军的目的、手段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季氏的私心野心昭然若揭，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谋私利，这不能不说是季武子人生的败笔。



鲁南铁道大队英雄徐广田

高 雷

铁道游击队因刘知侠的小说而蜚声海内外，刘知侠的创作冲动来源于山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徐广田的典型发言。时代造就了鲁南铁道大队这个战斗英雄的群体，而徐广田是铁道游击队这个英雄群体的杰出代表，铁道游击队的每一步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历史已抹不去他的身影。虽然解放战争时期他脱离了革命，但在抗日战争中他却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传奇人物，他的英雄事迹曾经广为流传。在铁道上与日伪军打了七年，鬼子汉奸只是闻其声，不识其面。谁是徐广田？来无影去无踪。汉奸们赌咒：缺德碰上徐广田；而鬼子听到徐广田的名字也很失态，颤抖着说：毛猴子，无孔不入的大毛猴子。

徐广田，1918年出生，山东枣庄人。中等身材，脸孔微黄，说话时面



鲁南铁道大队

带微笑，慢声慢语，眼睛也常眯缝着，特别沉着，波澜不惊，看上去像个腼腆的姑娘，可是一旦眼睛瞪起来，却充满了杀机。他始终揣着一根旱烟袋，不时地摸出来凑在嘴上，很庄户，属于那种没有明显特征，让人转眼就忘的人物。

徐广田出身贫寒，13岁就到枣庄炭窑掏炭，每天掏一挑，卖2角钱。两年后下窑拉炭，中午12点下窑，夜里11点完工。每趟拉两筐子，每筐有一百八九十斤。巷道低矮阴暗，闷热潮湿，干活都是光着膀子，还是挥汗如雨，累极了伸伸懒腰。把头从来不会客气，解手时间长了也会招打。徐广田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坚持了两年。

为了照顾家庭，两年后他回到了井上，在炭场推炭。有一次火车尚未靠站，他瞅空歇歇，监工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骂。那时的徐广田已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羞辱使他多年积聚的怨恨像井喷一样突然爆发了，他顺手捡起一根铁棍，把监工敲翻在地。活是不能干了。他闯进了公司办公室，找到了大把头讨要欠他的工钱，大把头想扣除狗腿子监工的养伤费，徐广田咆哮不已，要刨了办公室里的柜台。终究要回了十天的工钱三元多钱。

不久他又做了铁路上的擦车工，闲时帮助火车司机烧火车的锅炉。由于烧锅炉，他学会了开火车；由于擦车，他熟悉了每一种车头，每一种车厢，车厢上有几个门，甚至车皮上有几个螺丝钉。他家离枣庄3里地，紧靠铁路，为了每天上下班方便，他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本领——徒手爬火车，上下如履平地。

1938年1月17日，日寇占领了枣庄，接管了炭窑，他与同伴们丢掉了饭碗。为了谋生他参加国民党崔五的华北五〇支队，干了三个月，见没有前途，开了小差。凭借着一身飞车本领，他开始上火车偷炭。1938年10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选派洪振海和王志胜潜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在继续搞好抗日情报工作的基础上，筹建抗日武装。情报站除洪、王二人外，逐步发展了赵运有、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友、曹德全六名骨干情报员。为隐蔽身份，他们开办了“义合炭场”，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因炭场子由八名情报员合“股”开办，故又称“八大股”。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每到夜晚，他们就飞身列车卸取日军掠夺的煤炭，同时不间断地将情报秘密送往山里。由于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利润很是可观。徐广田盗取煤炭时，发觉列车上敌人运送的机关枪、大盖子枪没有人看守，他见物生心，又有了新的念头。1939年正月一个朦胧的月夜，他与洪振海、王志胜飞上了火车，十三支大盖子枪从车上轻轻地放下来，两挺机关枪也被拆卸带了下来，送到八路军苏鲁支队，换了匣子枪。

搞机枪成功后，徐广田深受鼓舞，他兴致大发，又瞄上了日军铁甲车上的小钢炮。漆黑的夜晚，他与王志胜等人带了两把钳子，摸上了鬼子的铁甲车，卸下了几颗螺丝后，下面有个人害怕了，发出了声音：“鬼子的钢炮，找不着了，了不得。”声音惊动了车里的鬼子，子弹“呼呼呼”地从车里飞了出来，徐广田、王志胜跳下车来，一口气跑出了五六里地。把徐广田气得几天都不搭理那个怕死鬼。

他们有了八支匣子枪以后，打出了铁道队的旗号。洪振海是队长，赵运友是队副，徐广田、王志胜是班长，他们一共集合了28个人，同敌人开始了面对面的武装斗争。

1939年7月17日，十七八个徒手的铁道队员，在枣庄站化装上车，车厢里有11个鬼子，队员们就坐在了鬼子的左右对面。火车开出枣庄窑三里地，车厢内一拍掌，约好的八个带短枪的铁道队员，就飞上了列车，鬼子拔出枪来要打，很快被围在他们身边的“客人”全部抱住。11个鬼子全被打死了，铁道队缴获了一挺日本机枪，二支长枪，一支快慢机，一支匣子枪。

日军在枣庄开设的“正泰国际公司”，群众称之为“洋行”，是一个以经商为

掩护的特务机构。1939年8月，洪振海他们乘夜摸进洋行，将三名掌柜毙二伤一。1940年5月下旬，铁道队从枣庄送来的情报中获悉，驻枣庄日伪军将到山里“扫荡”。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决定，再次袭击日军正泰洋行。正泰洋行自1939年8月遭铁道队第一次打击后，由原来的3个日本特务增加到12个，由茅山一郎大佐任大掌柜，院墙也架设了铁丝网。经过周密侦察，洪振海、王志胜、徐广田带领32名队员，分成5个战斗小组，在院墙上挖洞进入，二袭“老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片砍死。是役共杀死13名日军和一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在群众中盛传的“血染洋行”。

1940年7月，苏鲁支队经与中共沛滕边县委协商，将收编的两支铁道队与鲁南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王志胜分任正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原鲁南铁道队为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大队部跟随主力一中队活动。

铁道大队队员多数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的江湖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沾染上了放荡不羁的散漫习性。有一次，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利，烦恼中喝了一肚子闷酒。回队后杜政委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他几句。徐广田本就窝火，经政委一批评，顿时酒力上涌，顺手抓起一根树枝，照政委身上一阵乱抽，嘴里还骂咧咧地说：“你算老几？敢管我！”杜政委身上虽被抽得鲜血直流，可并不还手，只说了声“广田，你喝醉了”，就让人扶他去休息。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要给政委磕头赔礼，政委抓住徐广田的手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兄弟。”徐广田当众发誓说：“奶奶的，我今后再也不喝酒啦！”杜季伟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了铁道大队的中坚力量。

9月的一天，铁道队获知有一班列车托运了100多吨药品、20多支枪。他们及早做好了准备，在王沟街西撬掉了铁轨。火车拉着汽笛向王沟驰来，“轰隆”一声巨响，庞大的身躯倾倒在路基下的田野里，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跳上火车的20多个短枪队员全部被摔昏了，附近据点里的鬼子四面夹击，枣庄敌人的大炮呼啸而至，临城的铁甲车也开了出来。徐广田带着埋伏在周围的长枪队员勉强挡住鬼子的进攻，掩护着战友们撤退，100多吨药品只好白白放弃。

1941年初，形势恶化，经鲁南军区批准，铁道大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剩下不足20名队员在铁路两侧坚持游击战争。

1941年7月，敌人对山里八路军根据地大“扫荡”，铁道大队接受了上级的任务——“碰车头”，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于是临城、枣庄、韩庄、沙沟都各派去了一个组。徐广田跑进枣庄一看，一列煤车跟在一个车头的屁股后，静静地躺在铁轨上；车站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孤独的车头，他很快地上了那个拖着煤车的车头，开出了站台。等到站上的人发现时，徐广田已经把另外一个车头开回，飞快地向着这煤车撞来，“轰隆”一声，两个车头同时倒在路旁。而徐广田在未撞以前，已跳下车来，又爬上了另一个车头，也开进了这同一轨道，当车站上的人正被这碰车巨响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第三个车头又撞上了。车站里慌乱了，人们乱跑着，等到站里稍微平静下来时，徐广田早已出了站。

1941年10月，他们不到10个人，在临城车站上打了个漂亮仗。第一天，他们先派刘金三穿着鬼子的黄军装，堂堂皇皇地进站去侦察，看见站台上满是鬼子，不得不折了回来。经过周密策划，第二天晚上，徐广田与王志胜梳着洋头，穿着皮鞋，“大摇大摆”地进了站里，两个鬼子正伏在桌上睡觉，两支快慢机搁在面前，他俩迅速地拿起敌人的快慢机，打死了眼前的鬼子，后来进去的队员将屋里的两挺机

枪、13支大盖子枪都扛了出来。等站里敌人发觉了，徐广田等用四支马枪堵住了站台打，鬼子刚一露头，他们一枪就打了回去。孟庆海一支短枪四个手榴弹堵住了大门房，使得100多鬼子出不来，等到鬼子出来时，站台上的“毛猴子”早不见了。天明，临城出动了六七百鬼子在附近扫荡了一番，遮了遮羞。

1941年11月，在临城站外，徐广田带铁道队两个队员飞上了火车，在火车上捉住了车队长。通常押车的是四个带枪的伪警员，那天只有一个，还没带枪。车进沙沟站时，站上用灯光通知，可以继续前进，火车司机加大马力开出了车站。到了沙沟南面，徐广田他们约好等候人的地点，把“封管子”一掰开，火车就停下了，摘下了后面的三节，再把“封管子”接好，火车头带着前面的几节车厢开走了，后面三节车里的东西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过了一个月，徐广田他们探听到某班车上有大批布匹，于是夜里他们又等候在铁道边。车来了，他们跳了上去，但车门却关着，于是他们就蹲在钩头上，拉下了后面的一辆车，押车的三四十个鬼子一点儿也不知道，车上十几吨的布匹，都被他们扛下来了，把空车放了一把火。火光冲天，照亮了铁路沿线的夜空。鬼子的列车到了徐州，才发现少了一节车厢，为讨回损失，出动大队人马围剿铁道大队，追到微山湖边，天水一色，白茫茫一片，只好打了一阵乱枪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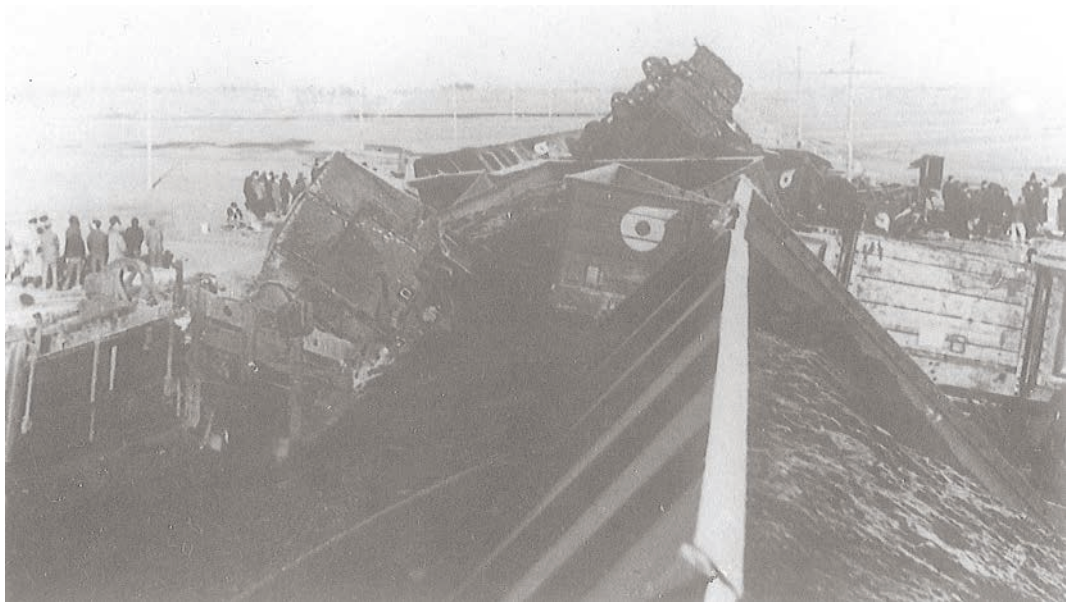
机警、果敢是徐广田的特点。埠家岭村里驻着几个伪军，还有一个隐蔽在那里的特务头子，做了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徐广田等六个人，穿了鬼子衣服进去了，两个带着短枪，用流利的日本话，要那个特务领路。那个特务说：“我一领路不就公开了吗？”徐广田立刻变了脸说：“你这毛猴子的有。”特务说：“没有没有！”“你变了心的！”“没有！”“皇军不要你了，你把东西都交出来。”于是那个特务把证书文件调查材料报告等等，都恭恭敬敬地拿了出来。徐广田又对他说：“跟我上临城见大队长。”特务不情愿地说“就去”，于是跟着他们出了庄。一出庄，徐广田就把他捆起来了。

特务不明底里问：“你们究竟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就是徐广田。”

特务听了大惊失色，发抖说：“鬼子……来……了，我不说……不行！”

徐广田把特务交给他的文件在手里一扬：“有这包文件已坐实了你的罪恶。”



被鲁南铁道大队炸毁的日军军用列车

把他押回了铁道大队。

一天，徐广田穿着西装皮鞋，把快慢机插在腰里去沙沟站侦察。在窑子门口碰到了四个特务带着短枪从里头出来，他询问他们哪里的，四个特务说：“北站（沙沟站）的”。回问他是哪里的，徐广田说是“枣庄的”。因为枣庄是日军宪兵大队部，沙沟是宪兵分队部，那四个家伙听了后，对他非常客气，让他进去喝茶。徐广田故弄玄虚地告诉特务们说：“听说这里很乱，八路军里有个徐广田真是英雄，枪打得非常好，谁碰上了就倒霉，你们可得注意。”四个特务听了，只是“是是”地答应。这时候，沙沟有十几个伪军来查窑子，四个特务中的一个，就急忙跑出去拦住了他们说：“你们不用进去，里面没有坏人，一个枣庄窑上来的兄弟正在训话”。于是十几个伪军大摇大摆地走了。徐广田在窑子里抄下四个特务的名字出来后，四个家伙一直送着他，并且要保护他回枣庄，经他再三婉拒后才走。几天后，他写了一封信派专人送去，要那四个特务报告“本部情况和毛猴子的情况”。那四个家伙知道这是“上级”来的指示，就很详细地报告了来，于是铁道大队对沙沟宪兵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最后一次徐广田写信叫特务们在窑子里等着，有要事相商，那天铁道大队去了四五个人，就把敌人特务都逮起来，缴了枪。教育了两个月后，遣送回乡了。

早在华中经鲁南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开辟之前，军区首长在充分肯定了铁道大队前段时间的成绩后，就给他们布置了新的任务：出山后除继续发动和依靠广大抗日群众，扩大活动区，粉碎敌人的伪化外，还要做好护送过往干部的准备。铁道大队在山区整顿精简后只剩下30多名队员，由刘金山、杜季伟率领出山。194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山东滨海（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检查指导工作。7月底准备返回延安，鲁南军区就把护送刘少奇同志跨越津浦铁路的任务交给了鲁南铁道大队。这是铁道大队第一次执行护送任务，队领导心里都很紧张。少奇同志在小北庄接见了大队领导。少奇同志亲切、和蔼的谈话，使他们消除了紧张情绪。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分组实施。第二天晚上，顺利地将刘少奇送进微山湖里的船上。

1942年12月，鲁南军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将活动在该地区的微湖大队、鲁南铁道大队、滕沛大队、文峰大队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铁道队被编为第二大队。为保持“飞虎队”对敌人的威慑力量，二大队对外仍称鲁南铁道大队。铁道队在独立支队领导下，队伍迅速壮大，最多时已近400人，下辖三个短枪中队和三个长枪中队。但他们肩负的任务，除配合独立支队完成统一作战计划外，主要工作仍是护送过路干部，保卫交通线。自护送刘少奇同志后，铁道大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特别是华中经运河地区去延安的交通线开辟之后，铁道队的护送任务更加繁重了。山东的过路干部由鲁南军区移交给铁道大队，而华中的过路干部则由运河支队移交给铁道大队，两路都从铁道大队的活动区横越津浦路去湖西。每次护送干部，尽管铁道大队都进行详细侦察，也有出现意外的时候。如有时护送干部正要过铁路，突然碰上敌人的铁甲巡逻车，沿途敌伪据点临时增兵等，但铁道队员们凭着智慧和勇敢，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鲁南铁道大队从1942年7月起至1944年止，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并给主要护送人徐广田记一等功。

铁道大队对敌人的威胁打击太大了，敌人寝食不安妄想消灭他们。1943年6月在彭口闸，就是最危险的一次。他们正在那里开干部会议，敌人出动了两辆汽车跟踪而至。那天徐广田正有病，一听见发现敌情，就拿快慢机冲向会场，准备去通知开会的同志。大家正在睡午觉，还没来得及叫醒他们，13个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

枪，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进了大门。他只好堵在二门口，一梭子子弹打倒了3个，打伤了5个。敌人第一次冲锋就被打垮了。他上好第二梭子子弹时，鬼子又闯进来，他又打倒了两个。这时开会的同志都已经起来要往外冲时，鬼子两挺机关枪堵住了门口，他与刘金山当时就负了伤，在院子里坚持了一个多钟头，铁道大队的两挺机枪已打了四五百发子弹，长枪队的每人四个手榴弹都已打光了，于是只好退到后院，准备突围。关键时刻，徐广田挺身而出，带着短枪班，一排子手榴弹打出去，敌人往后一退，他们在烟雾里翻过一道墙冲了过去。敌人接到的情报，只知道有十几个人在里面开会，看他们短枪班冲出去了，就以为是全部，就想全力消灭他们，坐汽车拼命追。这时后院里其他同志就都趁机冲了出来。这些人刚跑到离彭口闸半里的地方，就与前来支援的伪军打了起来。机枪一响，追赶徐广田的鬼子们知道出了纰漏，后面还有“大大的毛猴子”。舍弃了徐广田他们，去合击铁道大队的领导。徐广田他们脱险了，大队领导们突出了重围。这一次战斗，机枪射手张福贤负重伤被鬼子捅了12刺刀，另外还牺牲了一个排长，一个战士，挂彩7人，突围跑散后，负伤的徐广田带着一个战士躺在高粱地里睡了两天才归队。

铁道大队每一次遭受危险时，当地老百姓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援救他们。有一次，徐广田在村里养病，17个鬼子，6个伪警备队员进了庄，他迅速撤离，一个给伪军带路的狗腿子，模模糊糊认识他，看到他的身影说：“前面走的是毛猴子。”当时村长在旁边争辩说不是，两个伪军不知死活去追，看他加快了步伐，伪军开了一枪，徐广田回过身来，一扬手，“哒哒哒”就是十几发，伪军趴在了地上。等徐广田不见了踪影，两个伪军才跑回来，村长对伪军说：“假使你是中国人，就说枪是你们打的。”鬼子过来询问，伪军否认跑走的是八路，鬼子上去就是两个耳光，之后把两个伪军和村长押起来，拷打了好几次。

又有一次，徐广田等30多人在某村住，哨岗放在西北，但敌伪100多人却从东南进了村，他们要打，村长说：“不要打，我保险你们。”敌伪要搜查村里，村长就说：“搜出一个毛猴子，把我的头砍掉。”鬼子说：“你说没有也要搜。”村长说：“我看着你搜，你把指挥刀拔出来拿着，假使你搜出一个来，当场就把我杀死。”鬼子相信了，说：“你大大的好”，没搜就走了。于是徐广田等30多个人迅速转移了地方。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徐广田的枪发打得很准。在100米以内他可以百发百中。1943年军区在平邑郑城开检阅大会，他试了一下，黄昏时刻，150米的距离，他三发两中。

徐广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而顽强。他兄弟五个，老二病故，老三出来抗战，在古定战斗中牺牲，老五徐广才同他在一个部队里，也是优秀的战士。老大徐广林，本来也在铁道大队，1942年9月上枣庄窑去侦察时，被鬼子逮住，老百姓去保时，鬼子说“不要来保了，叫徐广田来顶替。”徐广田知道后，就说：“不要说这老大走了，就是把我一家都杀死，我也不去看，留着我还要报仇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铁道大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6年3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撤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鲁南铁路局。大队长刘金山任副局长，副大队长王志胜任局工会主任。铁道大队部分骨干转业地方，分别担任了津浦铁路兗徐段和临枣支线各火车站站长。徐广田却仍然是长枪中队的中队长。这样做是因为长枪队是清一色的日式装备（歪把机枪，六〇炮，三八式步枪。而且每个队员都头戴日本钢盔，脚穿皮靴），上级不忍心拆散，把它保留了下来。而长枪队长期由徐广田担任领导，别人也难领导这支部队，所以仍让徐广田负责。长枪队更名铁路局警卫连，徐广田任连长。

铁路局大包干代替工资，以职务折合小米发给职工。刘金山每月发300斤小米，

王志胜发200多斤，其他段长、站长每月发150到200斤小米。徐广田与铁路局警卫连官兵实行供给制，每月发一元津贴。徐广田的哥哥参加铁道游击队受伤致残，弟弟也在铁道大队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本人也负过几次伤，家里没有土地。抗战时期，铁道队员抢鬼子火车，时有分成。胜利后，铁道扒了，他们的家属没有了生活来源。徐广田的父亲和爱人，抱着孩子找到部队，他的父亲拉着儿子的手说：“人家都是抗战八年，你也是抗战八年，现在人家都当了大官，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段长、站长，你怎么还是个中队长呀！”他的爱人抱着孩子对徐说：“听说刘金山、王志胜每月都挣二三百斤小米了，可是你还是老样子，让俺娘们可怎么过日子啊！”说着就落下眼泪，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吃，她经常挨饿。

刘金山不是铁道队的元老，他1940年9月参加铁道大队，曾任洪振海的通信员。老洪牺牲后，按资历徐广田曾是大队长人选，组织上提拔刘金山当了大队长。这是徐广田与刘金山隔阂的起因。

这时，徐广田对刘金山有意见了，他以为这是因为自己不大服气刘金山的领导，所以刘报复他，没有把他分配到铁路上去工作。为此，徐广田对刘金山很不满，憋着一肚子的气。

当时领导对徐广田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徐广田是山东军区命名的一等战斗英雄，他在铁道大队的抗日战争中是有贡献的。日本鬼子投降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抬头，组织纪律性差，可以也应该好好进行教育。但仅仅为了保存一个长枪中队，不提徐广田是不适当的。当时鲁南军区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下令调徐广田到军区学习，学习结束准备任命他为鲁南军区某部营长。他没有毕业就不干了，不辞而别。铁道大队的作者知侠到他家规劝过他，徐广田说：“八年抗战，我没有熊过，现在鬼子投降了，他们竟这样整我，我真受不了这个气。我不干还不行么！现在部队号召老弱病残人员复员，我身上有不少伤，我复员好了，这样还可以照顾下家里的生活。”

内战爆发后，徐广田放弃了原则，迷信江湖义气，在把兄弟原抗日根据地区长乔秀峰的拉拢下，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虽然干了两个月就回家杀牛卖肉去了，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解放后，因徐广田曾投敌叛变，为公安部队逮捕，由于他在敌人那里时间不长，又没大的劣迹，判了两年徒刑。出狱后，经刘知侠介绍在枣庄矿务局井下挖煤，干了不久，因为喝醉酒和人打架被开除。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因贫病交加而去世。

记忆中的老建筑

五贤祠碑亭

本 编

五贤祠，原位于临沂县老城南关外，是明嘉靖年间沂州知州何格所建，以祭祀诸葛亮、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五人。清乾隆十六年，沂州知府王埏主持迁于洗砚池东重建，并更名为“五贤祠”。五贤祠几经战乱至“文革”损毁，于2003年复建于洗砚池街王羲之故居内。上图为清朝所建的五贤祠碑亭。

五圣贤是指诸葛亮、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均出自临沂，他们其中有一代书法家，还有政治家、军事家。他们为官一任，勤于事功，主张精关简文，进言改革，一生抱有救国旷世之志，以国事为重。

五贤祠主体建筑为硬山式大殿三间，殿内正中有一尊诸葛亮坐像，上题“忠冠云霄”四字；东侧有王祥、王览二位坐像，题有“孝感天地”四字；西侧有颜真卿、颜杲卿二坐像，题有“忠冠古今”四字。大殿前面是御碑亭，亭内有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临沂时题写的碑文：“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躯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



沂蒙抗战版画群体 (下)

大荒堂主

郭梦家 原名郭牧，1916年出生，山东诸城郭家庄人。1934年夏，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于西画系。1935年冬，郭梦家加入了左联的外围组织“文会”，与江丰、野夫等人结识，从此开始参加版画界的活动。1937年冬在诸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到莒县一个由土匪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部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受中共滨海区党委安排，到青岛做地下工作，供职于金融界。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副经理。此后调至上海市商业二局工作。代表作品《1935.12.24》。



郭梦家作品《1935.12.24》

师群（1921.7—1991.5） 又名师征。山东章丘人。擅长版画。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入山东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49年后历任中南文联美术组长，中南局《长江日报》摄影美术组长，中南美专办公室主任，武汉美协副主席，湖北艺术学院副院长，湖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顾问。



师群版画作品《血战青纱帐》

刘晓刚 1931年生于山东沂南县，1945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在鲁中大众报社、鲁中南报社、农村大众报社、大众日报社工作。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顾问，山东画院高级画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作品有大型木刻组画《沂蒙颂》。



刘晓刚作品《愤怒的火焰》



世界第一橡胶坝建设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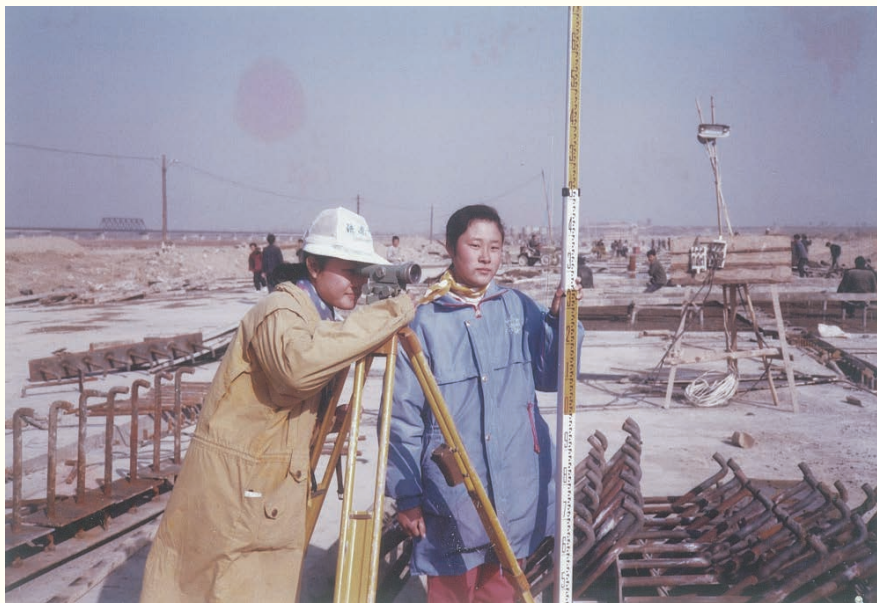
本 编

临沂小埠东拦河橡胶坝，位于山东临沂市沂河城区段，由临沂市水利局组织施工建设和管理。工程于1996年1月动工，1997年1月竣工。橡胶坝全长1135米，由16段组成，每段70米；最大坝高3.5米；拦河坝最大蓄水量为2830万平方米，回水长度10.8公里。橡胶坝水利枢纽工程在发挥水利工程作用的同时，拦蓄1.6万亩景观水面形成沂蒙湖，与橡胶坝一起形成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临沂市民休闲、娱乐、观光的好去处。2001年9月，这里被水利部评为首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8家之一，2016年小埠东橡胶坝被水利部评选为全国“十大最美水工程”之一。2006年小埠东拦河橡胶坝入选第四届吉尼斯世界纪录——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橡胶坝。

（照片由大荒堂提供）



繁忙的工地



精心测绘



夯实基础



覆设橡胶气囊



研究施工方案



调节水闸



建成后的橡胶坝远景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六)

赵丹峰



朱瑞系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时，相继任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军委书记。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地区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以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开展对日作战。6月，朱瑞和徐向前到达沂蒙山区，8月1日，二人通电就职。8月9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成立了由朱瑞为书记，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的山东军政委员会，对山东党政军民诸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同年10月，中央任命朱瑞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至1943年9月朱瑞奉命回延安由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止，朱瑞主持领导山东全面工作长达4年多的时间。朱瑞到山东时，正值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以他为班长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即省政府的前身）和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等八路军主力部队及各级地方部队与民兵组织，均有了长足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亦搞得红红火火。1941年冬，侵华日军调集5万重兵，对以沂蒙地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以“铁壁合围”“分进合击”为特点的拉网式大“扫荡”，使山东抗战形势急剧恶化，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顽三面夹击之中。在这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朱瑞的爱人和战友、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委委员的陈若克，因近临产行动不便而遭敌抓捕。日军在诱降无果的情况下，将她和刚出生的女儿一起杀害。朱瑞为此撰写了题为《悼若克》的文章，以寄托对她们母女的无尽哀思。在此严峻形势下，朱瑞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山东军民咬紧牙关，苦战苦熬，与敌展开了殊死斗争，使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权在极端困境中得以生存、巩固与发展。特别在刘少奇受中央委托来山东检查、帮助、指导工作后，在朱瑞主持下，山东分局认真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巩固抗日政权，努力争取党在山东的优势”的战略方针，使山东的抗斗争逐步走出了困境，到1943年秋朱瑞离开山东时，山东的抗日斗争和各项工作，已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和发展。回延安后，朱瑞先入中央党校学习，后被中央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为创建人民炮兵部队，改变八路军“小米加步枪”的单一武器装备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人民炮兵之父”。抗战胜利后，他按照中央指示，带领炮校师生跋山涉水赶赴东北，相继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他带领指战员搜索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培训炮兵干部，创造性地提出“集中使用、步炮协同、抵近射击”的战术原则，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46年5月，在几近白手起家的基础上，便使东北炮兵部队形成拥有700余门大炮、50余万发炮弹及12辆坦克的可观规模，在日后解放军的攻坚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辽沈战役开始后，东野主力迅速向北宁线奔袭。在摧毁锦州以北义县县城这一坚固堡垒的作战中，朱瑞指挥炮兵部队向守敌开炮，将南、东两面的城墙炸开3个三四十米宽的大豁口，为突击部队发起总攻扫除了障碍。当朱瑞赴前线察看炮火轰炸守敌城墙时，不幸触雷牺牲，年仅43岁。中共中央获悉噩耗后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为纪念朱瑞，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经全国人民投票，朱瑞被推举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其英名既被镌刻在共和国荣誉殿堂的丰碑上，也永远被铭记于他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山东革命老区、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曾任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作为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人民的高度信任与爱戴。

在文化科教领域，有突出建树的朱姓名人主要有：朱自清系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和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2年发表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现了诗人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开始古典文学研究和散文创作。此期的代表性名作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背影》等。上述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淡逸，语言凝练，文笔清隽。经过时间的过滤与印证，已被公认为经久传诵的经典之作，属现代以来散文精品序列中的精品。1931年赴英、欧留学，回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因贫病在北平逝世，保持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和传统“士”的高尚气节与凛然风骨。

朱德熙系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学术委员、国家语工委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等职。终身致力于汉语语法和古文字研究，在现代汉语语法的描写研究和变换分析方面造诣精深，影响广泛，享有极高的声誉，堪称中国汉语学与古文字学泰斗。著有《语法修辞讲话》（与吕叔湘合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讲义》《语法问答》和《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

朱光潜系中国著名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早年先后赴英、法研习哲学、心理学和艺术史，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美学学会会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于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系中国现代第一部系统的美学开山之作。他对美学的研究纵贯古今，为沟通中西美学思想及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所著《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发展史的著作。出版重要美学文

艺学专著计11种、译著7种。结集者有《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和《朱光潜美学文集》（五卷本）等。

朱东润系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和传记文学作家。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他和郭绍虞、罗根泽一起，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人。其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人物为经，从孔、孟、荀诸家论起，迄止清末，使历代批评中的代表性人物形象鲜活，粲然列目。所著《陆游传》《梅尧臣传》《张居正大传》和《杜甫叙论》等4部传记作品，旁征博引大量史料，对传主各自的人生际遇、文学成就等，均作了透彻的分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传记类题材的重量级硕果。另有《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和《中国文学论集》问世。

朱既明系著名病毒学家。先是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赴英留学，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他长期从事病毒学研究，是公认的中国病毒学研究的奠基人。由他主持的流感病毒变异、麻疹疫苗、乙肝基因工程疫苗等项科研项目，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人们的健康带来了福祉。

朱洪元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早年赴英留学，获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室主任、第一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该所学者会议成员和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等职。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与胡宁共同领导组织若干学者，与国际上同时提出并系统研究了层子模型理论，开拓了强子内部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和物理学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光亚系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与组织者。他早年与李政道一起，随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赴美考察原子弹制造技术，因美国政府对这批中国国民政府派来的专家保密，在考察组无果而终解散后，他又到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物理的研究，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57年任中科院原子能物理实验室副主任。1959年后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技术攻关的重任。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又组织实施了机载核航弹爆炸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实验，实现了中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后经努力拼搏，于1967年2月又使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作为著名的“两弹”元勋，朱光亚对名利极为淡泊。1996年10月，他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之后，毅然将全部奖金100万元港币悉数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和钱学森一样，朱光亚既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同时又是“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1994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代红嫂的爱党拥军情

李依璐 蔡文玉

201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张淑贞家庭成为我市唯一一个获得“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家庭。

张淑贞是百岁沂蒙红嫂，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儿媳，张淑贞的女儿于爱梅因爱党拥军，被评为沂蒙新红嫂。一家三代人不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始终秉承“爱党拥军、永远跟党走”的红嫂家风。代表全家赴京接受表彰的张淑贞的女儿于爱梅介绍，全家人听说获得全国文明家庭这个殊荣后都很激动，“母亲已经104岁了，无法亲自到北京，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



诉妈妈自己在北京的见闻，和老人家分享这一喜悦。”

王换于带领全家走上爱党拥军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淑贞的婆婆王换于家是山东著名的抗日堡垒户，是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社、姊妹剧团首长机关所在地，罗荣桓、徐向前、朱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在这里战斗工作生活过。

大型电视连续剧《沂蒙》中女主角于宝珍的原型就是王换于。王换于当时任艾山乡副乡长，她发动的第一人就是儿媳张淑贞，之后婆媳开始率领全家发动群众，抗日救亡。

王换于之所以被称为“沂蒙母亲”，是因为抗战时期她带领全家创办了“战时托儿所”，抚养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孤，这里面就有徐向前的女儿、罗荣桓的儿子和女儿等。解放后，这些革命后代回来看望王换于时，都和以前一样喊她“妈妈”，沂蒙母亲这个名字也就这样传开了。

张淑贞举起爱党拥军接力棒

张淑贞是爱党拥军的接力者。起初，张淑贞对共产党、八路军不了解，通过婆婆王换于的宣传，亲眼目睹过日寇“扫荡”，为掩护老百姓、豁出命去和鬼子拼刺刀的八路军的事迹，深受感动的张淑贞毅然跟着婆婆开始发动群众，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去。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到1943年间，张淑贞担任东、西两辛庄两个村的妇救会长，负责岸堤片13个村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党员，组织群众做军鞋、缝军衣、磨军粮、烙煎饼等支援前线。

当时，张淑贞为了照看好战时托儿所的革命后代，把刚出生的女儿放到一边吃糊糊汤，把奶水喂给年龄小、体质差的托儿所孩子。面对家人为何如此狠心的质问，张淑贞说：“自家的孩子，没了还能生养。同志们的孩子要是没了，恐怕就没有了血脉，咱自己舍上命也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就这样，托儿所的40多个孩子一个没有少，而张淑贞和弟媳有4个孩子却因营养不良而夭折。

如今，已过百岁的张淑贞从来没有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对于组织每个月发放的补贴，她常常感到于心不安，只要身体允许，就做军鞋、纳鞋垫，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用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言，用爱心传承着良好家风，用行动诠释着“红嫂精神”。

于爱梅传承发扬红嫂家风

张淑贞的女儿于爱梅，今年64岁，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从小听着奶奶和母亲讲述“创办战时托儿所、救护伤员”的故事长大，铭记她们“没有那些革命烈士就没有咱们今天好日子”的教诲。在父辈们的影响下，于爱梅这一代叔伯姊妹21人，有15人入了党、3人入了军，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本分做事、踏实做人。2004年，于爱梅从教师岗上退休后，从母亲那里接过了曾经纳过军鞋、缝过军衣的“红嫂针”，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拥军优属事业，十多年来她和沂蒙红嫂协会的姐妹们先后到沂南县人武部、武警中队，临沂军分区、临沂武警中队，济南军区、北京阅兵村、兰州军区打井队、国旗护卫队等慰问，每年定期看望老英模、老党

员、老红嫂和困难群众，制作拥军鞋垫5000多双，协调拥军物品价值100多万元。

2011年，山东省党性教育基地沂南教学点成立，于爱梅主动提出做义务讲解员。她在红嫂纪念馆为全省乃至全国党员干部群众作义务报告1000多场。有一次，60多岁的她发着高烧，仍顶着烈日坚持作报告，40分钟，汗水湿透了脊背，模糊了眼睛，但她的报告流畅感人，没有说错一个字。只是当掌声响起时，她的双腿再也没有一点力气，险些瘫倒在地。于爱梅说：“我奶奶和我的母亲都不识字，她们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为党和国家付出那么多，而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绝对不能拖她们的后腿。”

于爱梅说，她的大女儿和子侄辈的几个孩子都主动加入了红嫂协会，用各自的方式诠释良好家风、演绎真善美。她相信“爱党拥军、永远跟党走”的红嫂家风必将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正能量，带动更多的人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奋斗。





一卉能熏一室香

——李莉印象记

胡爱军

茉莉花，因其玉骨冰肌的容貌、沁人心脾的芳香和食药同源的特性，又因其不择环境条件的改变，始终坚守自我、忠贞不渝的品性，而备受世人的喜爱、赞美和推崇。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赞誉茉莉花的诗文词曲不乏其篇，尤其是南宋大家刘克庄在其《茉莉》诗中的“一卉能熏一室香”的名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李莉，无论做人、行医，还是从事医学科研，茉莉花的种种优秀品质在她身上熠熠可鉴。

为眩晕症患者送来福音的人

2014年10月，临沂市中医医院爆出一则重大新闻，该院与北京武警总院、山东省立医院等国内知名眩晕中心开展技术合作，成立了本市第一家与国际眩晕诊疗模式相接轨、集眩晕诊断治疗及康复于一体的专业诊疗机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眩晕诊疗中心，专门针对各类眩晕、头晕病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精确化、专业化的诊断与治疗。



这个现代化诊疗中心的担纲主角，就是本院耳鼻喉科主任李莉。

李莉于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临沂地区中医医院工作。她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近30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耳聋、耳鸣、眩晕等内耳疾病的诊治，在手术治疗各类耳、鼻、咽喉等炎症、病变、肿瘤和头颈肿瘤方面，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她曾先后在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进修学习。我国引进国际眩晕诊疗模式和国外先进诊疗设备之后，她被市中医医院首批派往中国武警总医院眩晕病研究所，专门学习进修这项专业技术。

眩晕症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也是长期困扰医疗机构的疑难病症之一。据统计，发病率约占人群的5%，占耳鼻咽喉科门诊量的15%。由于眩晕症病因复杂，涉及学科比较多，之前又没有专业化的眩晕诊疗机构，所以出现误诊的情况比较多。一方面，患者就诊有误区。因为医院没有设置眩晕专业科室，患者本来是耳性眩晕却挂号去了神经内科，本来是“耳石症”却挂号去了骨科，其结果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另一方面，医生诊断有误区。由于过去专门研究眩晕的医生很少，再加上各专业学科间交流不够，有的诊断不清的眩晕症被误诊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甚至有的“耳石症”被当作颈性眩晕做了骨科手术，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负担。因而，建立专门的眩晕诊疗机构势在必行。

市中医医院领导对此高度重视。按照院领导的安排，李莉学习进修归来，立即投入到眩晕诊疗中心紧张的筹建工作。首先，针对眩晕症病因复杂、涉及学科较多的特点，着手组建了一支临床经验丰富、高素质、高水平的眩晕专业医疗团队。这个专业化医疗团队以耳科医师为主，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心血管内科、康复科、急诊科、老年病科、心理科和中医科等专业医师参与。其次，在本院设立眩晕专科门诊、眩晕专家门诊和眩晕病房，强化医师和技师对国外进口设备临床应用的技能培训。目前，诊疗中心配备有国内最先进、最齐全的眩晕检测、康复设备，包括SRM-IV型前庭功能诊疗系统、美国EDI红外线视频眼震图系统、德国ATMOS varioair型前庭双温试验仪、VTS2000型前庭功能检查系统。这些国际一流的眩晕诊疗设备能够完成前庭功能的系列化检查，为疑难眩晕患者提供更加明确的诊断，并且可针对病因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其中，SRM-IV型全自动前庭功能诊疗系统，能够利用三维转动，定位、定量、定速对眩晕症进行诊断，精准、彻底、有效的将不同半规管内的耳石进行复位，将医务人员从传统的耗费大量体力的手法诊断与治疗模式中解放出来。同时，眩晕诊疗中心还建立了多学科会诊机制，对疑难性眩晕通过会诊、观察治疗等手段达到较高的确诊率。市中医医院眩晕诊疗中心成立以来，为上千名眩晕症患者解除了病魔困扰，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市中医医院的领导在注重加强眩晕诊疗机构建设的同时，还特别重视眩晕病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于2015年12月，在本院成立了“临沂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学术交流会议，会议邀请国内著名眩晕专家进行了学术讲座。在本次会议上，李莉被推选为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栉风沐雨吐芳华

李莉于1967年2月出生于新疆北屯市。父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师部的一名汽车司机，是自治区人大代表、劳动模范。1984年，李莉上高二，她参加了那年高考“冲线”，以优异成绩被伊宁市卫校大专班录取，是班里3个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1987年，李莉大学毕业后随父母返回原籍山东临沂，来到临沂地区中医医院耳鼻喉科报到正式上班。这年她刚满20岁。

李莉说，当她穿上白大褂，走进诊疗室的一刹那，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再是孩子了。她从候诊的各色人等的目光中感受到患者对于医生的期盼、渴求和信赖，心中陡然升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此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

她参加工作不久接诊的一个病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患者是一位家住费县探沂镇的有文化的老人，70多岁了。这位老人左侧鼻腔反复流鼻血有一个多月了，已经出现贫血症状，身体非常虚弱，经多家医院检查却查不出病因。这天老人再次来到中医医院就诊，由于当天的病号很多，忙不过来，坐班的老大夫就让李莉给他做再次检查。当时像李莉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是由老大夫传帮带。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比较落后，做耳鼻咽喉深腔部位检查，要靠额镜反光照明“三点成一线”目测观察。这种检查方式只能由一个人来做，别人根本无法从一边给予直观的指导和帮助。所以，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也只有根据教科书和老大夫的指点，凭自己的悟性去感受和揣摩。李莉检查的非常仔细认真，终于在老人鼻腔最不易观察到的位置——鼻顶夹缝里发现了一个红色肿物，原来是一个很小的血管瘤。这让老大夫惊诧不已。病因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手到病除，使这位倍受病痛折磨的老人终于得以康复。为此，老人专程从费县老家带来一大袋子地瓜，并且一定要送到李莉家里，以表达感激之情。这是李莉所经历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病例，却令她至今念念不忘。因为这个“第一次”，给了她满满的成就感和下决心做一名优秀的耳鼻喉科专业医师的信心。

医生是一个学无止境的职业。李莉深知，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领和推动了世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医学各学科的新技术、新成果、新观点纷呈迭出，如果不及时进行知识更新，加强自我“充电”，就有落伍的危险。

1998年，院里决定派她到全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最强的医院——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学习进修。当时她的女儿只有四五岁，正是需要母亲疼爱呵护的年龄，但是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她把心一横，将女儿交给老人看管，只身一人踏上了学习深造的旅程。

她在北大第一医院进修这一年，一点也不轻松。她除了每天按部就班到北大医院跟班学习之外，又利用空余时间，自费参加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解剖学习班、鼻内镜外科技术及临床应用学习班，还利用节假日骑着自行车专程到解放军301医院观摩学习。在北大医院，她和来自不同省市的7个姊妹同住一间地下室，休息和自习的空间非常狭小。闲暇时，别人出去逛街观光，她一个人留在宿舍整理学习心得。后来，她偶然发现耳鼻喉科病房会议室每到夜晚空无一人，是个看书学习的极好的去处，于是那里便成了她晚间专用的自习室。她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吮着当代耳鼻咽喉头颈专业



的先进技术和前沿知识，拼命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其后，2000年至2003年，她利用工作之余，完成了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专业本科教育，拿下了本科学历和医学学士学位。2005年，她又到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医院，师从于许庚教授，进一步学习进修鼻内窥镜微创手术。2014年，她被院里首批派往中国武警总院眩晕病研究所，学习国际眩晕诊疗模式和进口设备诊疗技术。

经过多次进修深造和多年临床实践，李莉的专业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临床手术技能日臻成熟。尤其在鼻内窥镜、纤维喉镜微创外科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她所开展的微创手术主要有：鼻内窥镜下经鼻激光+手术治疗先天性后鼻孔闭锁造口术、鼻内窥镜下经鼻增殖体刮除术、功能性鼻内窥镜鼻腔鼻窦手术、经鼻内窥镜鼻咽纤维血管瘤摘除术，以及鼻内窥镜窦口鼻道复合体开放术、上颌窦口扩大术、筛窦开放术、鼻息肉摘除术等鼻腔鼻窦手术，在鼻内窥镜下用YAG激光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用微波治疗难治性鼻出血，等等。同时，她还特别注重鼻内窥镜外科技术应用的延伸和拓展，积极开展了鼻内窥镜下脑脊液漏修补术、经鼻腔鼻内窥镜下蝶窦进路垂体瘤切除术，以及鼻内窥镜下鼻眼相关外科手术，开展了纤维喉镜下用激光治疗声带息肉、声带小结、声带乳头状瘤、喉狭窄及癌前病变等微创手术。鼻内窥镜等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术中创伤，减轻了病人痛苦，缩短了治疗和康复过程，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她还常年坚持听班急诊，及时成功的抢救了许多诸如鼻出血、喉梗阻、耳源性颅内并发症、外伤、支气管异物、食道异物等危重病人，从未发生过医疗差错事故。

她特别重视本专业的科研创新和学术工作。在科研创新方面，认真总结临床经验，不断探索新技术、新疗法。比如，在小儿鼻窦炎防治方面，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和体会，摸索出一套适用于小儿的鼻窦排气置换术，这一技术消除了患儿恐惧心理，较好的解决了治疗过程中患儿与医生的配合难题，深得患儿家长的赞许。她还利用在中医医院工作的优势，虚心向中医同道学习，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慢性咽炎、慢性喉炎、慢性鼻炎、鼻窦炎以及过敏性鼻炎，均收到很好的效果。2011年，由她主持完成的市科研项目《纤维鼻咽镜下硬膜外导管无创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研究》，获本年度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其成果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另外，她参与的《颈上神经节封闭治疗耳鸣、耳聋的临床研究》《牵拉复位法治疗颧骨、颧弓骨折的临床研究》《中西医结合冲击治疗免疫性不孕的临床研究》等项目，分别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在学术方面，她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市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学术研讨会和短期培训班，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她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实用老年病学》两部学术专著的副主编，同时在各级医学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篇，其学术成果受到业界广泛好评。为此，她先后被推选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眩晕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官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医师分会委员。

厚德载物，天道酬勤。这些年，李莉割舍的是安逸、亲情、名利，收获的是成功。

感动别人和感动自己

医生是一个很辛苦又很崇高的职业。李莉说，我们经常被自己感动着。事实上，作为医生，首先是感动别人，然后才是感动自己。

下面，就是发生在李莉身上的看似平凡却令人感动不已的几个小故事。

故事一：临沂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个本台录制的电视情景剧，说的是兰山区义堂镇居民杜某有个4岁大的男孩儿，被自家养的藏獒咬伤面部，伤情严重，经过市中医医院耳鼻

喉科的精心治疗康复如初，伤者家属感激不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殊不知，抢救医治这个男孩儿的主治医师正是李莉。听李莉讲，男孩儿刚送到医院的时候，腮上有贯通伤、撕裂伤，整个脸几乎给恶犬撕掉了一半，皮肉分离，惨不忍睹。之前，孩子曾先后去市内几家医院就诊，因伤势严重，伤情复杂，都没人敢接收。最后来到中医医院，男孩儿的父亲绝望到近乎疯狂的程度，一副要和人拼命的样子，一定要院方把孩子收下。李莉想，对于这种特殊病例，必须既要保住孩子健康，又要为他长大以后的生活工作着想，尽可能完美的复原孩子的面容。为此，她多方查找资料，制定了一整套治疗和康复方案。经过李莉和同事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孩子伤口愈合的很好，容貌恢复的也很理想。男孩儿的父亲是个生意人，也是个男人中的性情中人，他高兴的像过年一样，自己掏钱请来秧歌队，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旌旗烈烈，来中医医院表示感谢。这是该院建院以来头一回遇见这么大的场面，全院上下为之振奋。后来，男孩儿的父亲和李莉成了好朋友。

故事二：市中医医院接收了一个入室抢劫案的受害人，受害人脸上被歹徒深深地插入一把螺丝刀，螺丝刀从左眼眶外侧斜插进去，从左侧上颌窦穿过，又进入鼻腔，是一例极为罕见的贯通伤。由于伤情比较复杂，相关联部位涉及多个专业科室，没有一个科室敢单独接收。最后是李莉的耳鼻喉科冒着风险把患者接下来了。经过各种检查，李莉对手术能否成功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院方为了安全起见，决定三个相关科室一起上。但手术究竟由谁主刀又成了大家争议的焦点。还是李莉，她凭借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和以前进修学习所掌握的解剖知识，鼓足勇气走上手术台，小心翼翼的把螺丝刀从患者的脸上一点一点拔了下来，并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从而成功的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这件事不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而且李莉也被自己“感动”出一身冷汗。事后李莉总结经验说，看来关键时刻不仅需要必备的专业知识，有时还必须有一定的胆量。

故事三：这是一个年逾古稀的患者与李莉之间的“忘年交”的故事。几年前，这位老人因双侧鼻腔鼻窦长满了鼻息肉，前来耳鼻喉科就诊，李莉说你需手术治疗。开始，老人不相信眼前这个年轻的美女医生，又怕花钱，就悄然离开了。后来，这个老人在一家个体小医院做了鼻息肉摘除术，由于手术做的不彻底，不仅没有减轻症状，反而导致创口反复发炎流脓。老人觉得被忽悠了，无奈之下又返回头来，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找到李莉。李莉二话没说，为他重新清理伤口，做了彻底摘除。老人康复之后，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给李莉。他担心李莉自己不好意思把旗子挂上，专门从家里带上铁锤和钉子，来到耳鼻喉科门诊室，踩着凳子，亲手把旗子挂到墙上。在一旁候诊的青年怕他摔着，要上前帮忙，老人执意不肯。之后，每逢过年，老人都要再做一面新的旗子，带上锤子、钉子，把旗子挂在李莉上班的地方。平时，老人经常借口看过敏性鼻炎来看李莉。李莉坐诊，老人就坐在一旁看着。有一天，老人郑重其事的告诉李莉说，我看到了，你的医德非常高，不论穷富老幼都一视同仁。这个评价真的让李莉好感动。

在李莉身上，类似于这样的感动别人和被自己感动的故事不胜枚举。

希腊当代著名诗人塞弗斯在其名作《茉莉花》中写道：“不管是黄昏/还是初露曙色/茉莉花总是/白的”。全诗以铿锵深沉的语言和格调，赞颂了茉莉花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改变，都能坚守自我、不改本色的精神；无论面对诱惑，或是面对困境、面对成功，都能忠贞不渝、始终如一的高贵品质。

李莉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正是以茉莉花这种可贵的精神，出色的一次又一次实现了自我超越。

2017年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会议召开。7月7日，2017年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安排部署了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史志工作任务。各县区、开发区作了交流发言，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对2017年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对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全市史志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为全体党员上党课。7月7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以“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主题，为全体党员上专题党课。市纪委监委驻一组副书记宋永峰参加会议，市史志办全体在职党员参加了此次党课。

临沂市史志办贯彻落实《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启动会议精神。7月11日，市史志办召开党组会议，学习传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启动会议精神，学习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发表的讲话，研究确定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临沂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史志办全体干部职工接受廉政警示教育。7月19日，市史志办全体在职干部职工在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带领下，到市检察院廉政警示教育基地，接受现场警示教育。大家参观了案例展板，观看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片。大家一致表示灵魂深处受到强烈震撼，决心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汲取教训、牢记使命，不断增强自身法制意识和廉洁意识，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为“大美新”临沂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市史志办召开推进《山东抗日根

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座谈会。7月20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推进《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座谈会。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座谈会传达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启动会议精神和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同志的重要讲话，讨论修改了两部志书的《组稿方案》，明确编写要求和进度，细化任务分工，研究贯彻落实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的具体措施。

市史志办召开党风廉政专题会议。8月15日，市史志办召开党风廉政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党风廉政工作。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对2017年以来全办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作了梳理回顾，通报了近期开展的班子成员廉政谈话及市纪委对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对下步如何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相关制度规定、创新党风廉政活动载体等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史志办副主任唐少清到平邑县调研二轮县志编修情况。7月31日，市史志办副主任唐少清一行专程赶到平邑县调研二轮县志编修情况。

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摄制组一行到费县方志馆参观。7月3日，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摄制组策划导演王鹏一行来到费县方志馆参观，并对费县历史文化进行调研。

各县区史志办积极组织学习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会议精神。2017年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县区史志办纷纷召开专题会议，采取多种措施，贯彻落实上半年全市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及时传达会议内容，根据各自工作实际，研究

贯彻落实具体措施。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推进各项任务目标迅速落实到位，推动县区地方志事业健康科学发展。

知名作家明杰为费县方志馆捐赠个人专著。7月10日，知名作家明杰参观了费县方志馆并为费县方志馆捐赠个人专著18种40余册。

《费县年鉴（2017）》出版发行。近日，《费县年鉴（2017）》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设20卷，在延续上年编纂框架的基础上，内容作了进一步优化调整，设立了专记、图说新费等栏目，对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建设等重点、亮点工作予以重点记述。

肥城市史志办到沂水县考察学习史志工作。7月19日，肥城市史志办主任尉茂路一行到沂水县考察学习史志事业转型升级经验做法。

河东区第一部村志发行。8月17日，河东区第一部村级志书《九曲店志》举行发行仪式。该志是河东区第一部内容全面、结构完整、史料翔实的村志。上限自1282年（元至正十九年）葛氏迁居始，下限至2015年12月，全书共179万字。

《兰山年鉴》（2016）出版发行。近日，《兰山年鉴》（2016）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设特载、大事记、概况、政党、政务、法制、经济管理、农业、工业等19个部类，共66余万字，插图300余幅。

沂水县第一部村志《西朱家庄志》正式出版发行。近日，由沂水县西朱家庄编纂委员会编纂的《西朱家庄志》出版发行。《西朱家庄志》设政治、经济、人物、方言、民俗等19篇，共计70万字，100余幅图片。填补了沂水县历史上没有村级志书的空白。